

「國家」、「國故」與「國民」： 近代「國曆」的名實錯位與中西糾葛

王建軍*

一、引言

在近代中國，作為一種舶來品的西洋曆法——格里曆 (Gregorian Calendar)，¹ 有兩個主要稱謂——「陽曆」和「國曆」；其中陽曆是南京臨時政府與北京政府的官曆，國曆則係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定曆法。儘管在一般社會認知層面，陽曆與國曆均指西曆，但二者並不是簡單的一物二名，其間有著諸多極為微妙的差異。相關學者已從政治、社會、文化、科技等多重視角對民國曆法進行了深入研究，² 但既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探討民國曆法的二元結構與西曆在近代中國普及的過程，較少從稱謂變動研探近代曆法的階段性蛻變與「國曆」名號的獨特性。³

本文承朱慶葆老師、成功偉老師教示，張仲民教授、何卓恩教授以及兩位評審專家惠賜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另：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近代長三角地區中國式城鎮化道路的歷史進程與發展模式研究」(23VLS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 王建軍，江南大學歷史研究院校聘副教授

¹ 筆者按：當時亦有格利高里曆、格里高利曆、格雷果里曆、格勒果曆、格勒哥里曆、格雷高里曆、格雷高靈曆、格烈哥尼曆、格列可尼曆、古勒哥曆、額我略曆、額我曆、各列果良曆等多種稱謂。

² 相關論著有：張志明：〈中國近代的曆法之爭〉，《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頁106–19；左玉河：〈評民初曆法上的「二元社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222–47；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湛曉白：〈科學史和文化史雙重檢視下的民國改曆思潮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13年第4期，頁456–69等。

³ 如果從更廣闊的視角觀察，「公曆」這一概念也很重要，其與陽曆、國曆等概念亦有微妙的差異，參朱文哲：〈西曆·國曆·公曆：近代中國的曆法「正名」〉，《史林》2019年第6期，頁127–37。

近世以來，西力東漸，各種「洋」字號事物西來，⁴挾「尊西崇新」的時代大潮，代表「進步」、「現代」、「科學」等內涵，呈現取代中國舊有事物的態勢。在此「國」將不國之時，「國學」、「國醫」、「國術」等一大批與「洋」相對的「國」字號事物應運勃興（表1），這些國字號事物不但為中國所「固有」，甚至大多為中國所「獨有」。⁵「陰曆」為中國舊有曆法，⁶遵照國字號事物的習用命名辦法，此時本該順勢成為「國曆」，並「代表」中國與西（洋）曆競爭。但弔詭的是，當時反而是西曆「鳩佔鵲巢」成為「國曆」，並與陰曆相對立競爭。面對西力衝擊，各類國字號事物在近代中國有著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何以「國曆」如此突出？⁷

表1：近代「國（中）」—「洋（西）」相關詞彙對照表⁸

帶有「國（中）」的詞彙	帶有「洋（西）」的相關對應詞彙
國人	西人、洋人
國文、中文	洋文、蟹行文、英文、西文
國史	西洋史、西史、泰西史
國服、中服	西服、洋服、洋裝

⁴ 筆者按：近代「洋」的概念也比較複雜，所代表的內涵亦多元多變，不但有「東洋」、「西洋」之別，「西洋」內部亦各有分殊。「洋」不但與「國」相對應，在不同語境下，還與「中」、「東」、「華」、「舊」、「土」、「廢」等概念相對應。不過這一問題比較複雜，尚無比較詳實的研究，僅部分研究成果注意到「洋」、「土」、「國」的差異與競爭，參王楠：〈脫「土」入「洋」：近代「國貨」概念的現代性內涵〉，《北京社會科學》2024年第4期，頁46–55。

⁵ 近代國字號事物的相關研究成果，參桑兵、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⁶ 筆者按：所謂陰曆、陽曆，實際是據曆法推算方法所做的分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一種具體的曆法名字。回到歷史語境，彼時所謂「陽曆」與「陰曆」，一般特指格里曆（亦即所謂西曆、公曆、洋曆）與中國傳統曆法。而中國傳統曆法（亦即所謂的陰曆、農曆、中曆、舊曆），實質為兼顧地月與地日的陰陽合曆（Lunisolar Calendar），為行文方便與符合當時語境，本文主要使用陰曆這一稱謂。

⁷ 關於近代國字號事物的整體觀察，參桑兵：〈分說：近代中國國字號事物的命運〉，收入《近代中國國字號事物的命運》，頁47–53。

⁸ 本表按照筆畫順序排列，選取範圍大致參照桑兵〈分說：近代中國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一文所臚列的相關詞彙，並有所增補。筆者按：近代的「國」在一定語境下有時可以與「漢」混用，但有時又有一定的區別，如「國學」與「漢學」，「國醫」與「漢醫」，這一問題比較複雜，此處不詳論。此外，「洋」有時還與「土」相對立，比如〔下轉頁125〕

國棋	西洋棋
國貨(國產)	洋貨
國術(技)	體育
國教	洋教
國畫	西洋畫、洋畫
國語	西語、外語
國劇	西洋劇、歌劇
國儀(禮)	西禮
國樂、中樂	西洋樂、西樂
國學、中學	西學、洋學、新學
國藥、中藥	西藥、洋藥
國醫、中醫	西醫、洋醫、新醫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在一個重視「正名」的國度，常講求「名不正則言不順」，「國曆」所具有的某些戲劇性特質，似有可深究之處。本文通過梳理「國曆」這一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流布、演變、消亡的全過程，初步探討其名號的複雜性與特異性，或有助於關照近代國字號事物的整體面相與理解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各自特色。

晚清時期，中國傳統曆法通常有華曆、中曆、陰曆(太陰曆)等稱呼，而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洋曆法，則有耶曆、洋曆、英曆、西曆(泰西曆)、陽曆(太陽曆)等多種稱謂。⁹隨著西力東漸，西方各類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進步」意義，加上對外交流和與世界接軌的需要，西曆在中國的影響亦隨之增加。¹⁰

〔上接頁124〕

「洋貨」與「土貨」。此外，本表各詞所關涉的涵義不止一個，如「國教」，在不同語境下，既可指孔教，也可指道教，這裡只是取中西對照之意。同時，另有「國粹」、「國故」等「國」字號事物(概念)，含義較為寬泛(如國故作為國故學時，含義與國學相近，與西學、洋學、新學對應)，暫時找不到與之對照且比較具體的西洋事物(概念)，故本表未標示。

⁹ 筆者按：西曆從「洋曆」到「陽曆」的轉變也很重要，儘管口語中無甚差異，但書面語區別很大，其中蘊含著豐富的褒貶意味與價值判斷。要之，西曆、耶曆、英曆、洋曆、陽曆、國曆、新曆、官曆、公曆等詞雖大致指代同一種曆法：格里曆，但各自所關涉的涵義與態度仍有極為微妙的差異。

¹⁰ 晚清時，另一有關「時間」問題的重大變化是，新式歷史分期的引入與精英人士線性歷史觀念的興起，參見 Luke S. K. Kwong, "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 1860–1911," *Past & Present* 173.1 (2001):157–90。

清季梁啟超(1873–1929)等人已提出採用西曆的主張，未及施行而清亡。清季的另一個新情況是，在「皇帝年號紀元」外，還出現了十餘種紀元辦法，並以「黃帝紀元」與「孔子紀元」之間的符號之爭，最引人注目。¹¹其中，以倡議「黃帝紀元」的革命黨人之聲勢最為浩大，「黃帝紀元」在當時被作為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政治工具，表示不承認清王朝的正統地位。1903年，劉師培(1884–1919)發表「黃帝紀年論」，呼籲實行「黃帝紀元」，其後章太炎(1869–1936)、宋教仁(1882–1913)、黃節(1873–1935)、陶成章(1878–1912)等人紛紛呼應。梁啟超則力推「孔子紀元」，力圖切斷紀年與政權正統性之間的曖昧關聯，大力批駁將紀年與「奉今王正朔」等同的傳統觀點。¹²

時至辛亥鼎革，孫中山(1866–1925)將改用陽曆一事，視為「革命成功後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須辦到」，¹³就任臨時大總統當日即宣布改用陽曆，並於第二日通電全國。¹⁴該通電大致涉及兩個層面的內容：其一，以陽曆取代中國傳統曆法，亦即所謂的「改曆」；其二，以「中華民國」年號紀元代替清季以來的各種紀元，即所謂的「改元」。前者可以說是與世界接軌，後者則是傳統的部分延續。因此，也有人稱該通電為「改曆改元通電」。以「中華民國紀元」終結清朝「宣統紀元」與天命君權，又可宣示革命之正統，結束紛亂的政治局面，南京臨時政府改曆改元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南北議和後，臨時政府北遷，清代欽天監被接收並裁撤，新的製曆機構中央觀象臺旋即成立，並薦任高魯(1877–1947)為臺長。在高魯的主持下，中央觀象

¹¹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25–50。

¹² 關於清季民初「紀元」問題的相關成果相當豐富，參陳旭麓：〈清末革命黨人的紀年〉，《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期，頁17、33–34；竹內弘行：〈民初紀年考〉，《中國研究集刊》第7號(1989年)，頁21–29；村田雄二郎：〈康有為と孔子紀年〉，收入王守常、汪暉、陳平原主編：《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輯，頁513–46；竹內弘行：〈清末の私紀年について〉，《名古屋學院大學論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7月)，頁77–96。

¹³ 王有蘭：〈辛亥建國回憶〉，收入丘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296。

¹⁴ 〈臨時大總統改曆改元通電〉(1912年1月2日)，收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卷，頁5。

臺編纂的新曆書去除了方位、臨直、宜忌等內容，改記天文圖說、晝夜長短、節氣與紀念日，同時考慮到民眾與各行業很難立即轉為使用陽曆，曆書上依然標示與陽曆對應的陰曆日期。此後，至少在政府層面，除袁世凱稱帝與張勳復辟有短暫反覆外，推行陽曆的舉措是一以貫之的。¹⁵不過在民間社會，清代時憲曆大行其道，陰曆仍為主流，這一時期的曆法實際是陰陽曆並行，且陰曆為主。¹⁶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頒發曆書作為統治權的象徵」，¹⁷為宣示「正朔」，強化自身的政治權威，內政部於1928年5月擬定了「廢除舊曆，通用國曆」的八條辦法，¹⁸以陽曆為「國曆」，宣布廢止陰曆，拉開了「國曆運動」的序幕。至此，陽曆（西曆）在官方層面有了新的名號——國曆，國曆、陽曆也從此開始混用，並成為西曆在當時中國的主要稱謂。¹⁹

但以「國曆」指稱陽曆卻並非南京國民政府的首創，「國曆」一詞具體濫觴於何時，出於何人手筆，目前已很難確定。有研究者認為，自從孫中山刻意選擇在1912年的元旦就職成為民國的首任總統以來，「國曆」一詞就用於指涉陽曆。²⁰然而這一歷史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嚴諤聲（1897–1969）等人的構建與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國民黨的政治宣傳，而非歷史事實。也有學者指出，陽曆有許多

¹⁵ 筆者按：袁世凱復辟期間，用「民國紀元」還是「洪憲紀元」，代表著不同的政治態度，而魯迅較為特殊，採用「太歲紀元」，參竹內弘行：〈民初紀年考〉，頁21–29。

¹⁶ 陳展雲：《中國近代天文事蹟》（昆明：中國科學院雲南天文臺，1985年），頁83–108。

¹⁷ 同上注，頁7。

¹⁸ 〈內政部致國民政府呈〉（1928年5月7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輯第1編，頁424–27。

¹⁹ 筆者按：陽曆能取得「國曆」稱謂，與馮玉祥、薛篤弼有著密切關聯。陰曆1927年底，馮玉祥有鑒於「國曆與國民革命之關係」，發出了〈廢除舊曆提倡國曆〉的布告，規定了廢除舊曆，遵用國曆的辦法十條，通電豫陝甘三省政府各行政長官及各縣長一律遵辦（參〈開封廢舊曆運動：規定辦法十條，通令三省遵行〉，《大公報》，1928年1月6日）。該布告已將陽曆指稱為「國曆」，但一則此為地方行為，二則該布告實際影響寥寥，與國民政府的「國曆運動」不可同日而語。而內政部擬定「廢除舊曆，通用國曆」的八條辦法時的部長為薛篤弼，薛氏此前曾為馮玉祥部屬，二人關係密切，揆之內政部的這八條辦法與馮玉祥的「廢除舊曆提倡國曆」十條辦法又多有暗合之處，按薛篤弼此前的從政經歷，上述兩項辦法均出自薛篤弼手筆，亦不無可能。

²⁰ 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109–10.

優點，舊曆有迷信的色彩，而陰陽曆並行又帶來社會經濟上的諸多不便及混亂，所以人們對推行陽曆並將它定為「國曆」並沒有太多異議。²¹但民國時期，以「陽曆」為「國曆」遭到相當異議，並經歷了複雜的「重新建構」(reconstructed)過程。

目前有學者已將「國曆」的歷史追溯到1922年，彼時錢玄同(1887-1939)已經使用這一稱謂指代陽曆。²²不過以「國曆」指稱陽曆卻並非始於錢玄同，1912年12月出版、1913年1月發行的《世界年鑑》一書，編有〈本年各曆紀元表〉，該表已有所謂「民國國曆」的提法(表2)。

表2：〈本年各曆紀元表〉²³

曆名	紀元年數	曆名	紀元年數	曆名	紀元年數
民國國曆(即新曆)	中華民國二年	孔子紀元	二四六四年	耶穌紀元	一九一三年
民國舊曆	壬子至癸丑	猶太曆	五六七三年	回曆	一三三一年
黃帝紀元	四六一一年	俄曆	七四二一年	日本國曆	大正二年

此處之「國曆」雖概念混雜籠統，但頗具特色。首先是民國「國曆」(新曆)與民國「舊曆」相對應，紀年方式均延續傳統，前者襲用皇帝年號紀年之法，後者為傳統干支紀年，二者實際是古代曆書一般紀年辦法的拆分。²⁴其次，「國曆」為「新曆」，但並不等於西曆，「國曆」為民國紀元，與西曆紀元(耶穌紀元)並不一致。再次，此處「國曆」並非僅指代中國特有之曆法，而是有所謂「民國國曆」、「日本國曆」之分。最後，「國曆」雖名為曆法，實際降格為僅指示紀年。總的來說，後來「國曆」所具有的那種不新不舊、非中非西的獨特性，此處的「民國國曆」亦庶幾近之。

²¹ 左玉河：〈擰在世界時鐘的發條上：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收入《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1輯，頁156。

²² 朱文哲：〈西曆·國曆·公曆〉，頁130-31。

²³ 資料來源：神州編譯社編輯部編：《民國二年世界年鑑》(上海：神州編譯社，1913年)，「歲時類 曆法」，頁18。

²⁴ 筆者按：古代曆書紀年一般為皇帝年號紀年+干支紀年，如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宣統二年庚戌。

此後，「國曆」名號偶有出現。1916年11月，當時司法會議通過的一項議案將政府頒布的曆書稱為「國曆」。²⁵1921年，通俗教育研究會以該會名義於《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等刊物上發表〈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一文，解釋以陽曆為「國曆」的原因，並倡導民眾遵用。²⁶可能由於通俗教育研究會的重視，塞北通俗教育事務所還曾試圖在大同作「遵用國曆」的演講並贈送國曆月份牌。大同鎮守使張樹幟(1881–1946)為此事於1922年1月4日致電太原督軍，請示處理意見，閻錫山(1883–1960)令「阻止之」。²⁷

1922年12月31日，錢玄同按慣例在《晨報》登賀年卡片，恭賀新禧。不過這一年，為對抗不過民國新年的滿清遺老，錢氏改變了賀詞，特別在卡片上大書特書「國曆新年，敬祝幸福」八字，以「國曆」指稱陽曆。²⁸1923年，為響應中央觀象臺廢除陰曆之議，張延祥(生卒年不詳)等人組織了「國曆統一期成會」，並制定了具體章程，藉以廢除陰曆，單用陽曆，但實際參與者不過五人。²⁹

²⁵ 〈灌輸法律常識案議決書〉，《司法公報》第71期(1917年2月)，頁71。筆者按：以「國曆」為關鍵詞，檢索愛如生「《申報》數據庫」，共得52,884條記錄，其中以「國曆」指代「陽曆」者，最早出現在1917年(〈劃一民商通用書證之預備〉，《申報》，1917年4月15日，第3張，第10版)，與〈灌輸法律常識案議決書〉所載內容基本一致。

²⁶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2月15日，第2版；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續)〉，《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2月16日，第2版。又〈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最初可能為高魯於1920年所作，並以中央觀象臺刊名義印多份，分贈各界，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下冊，頁1584；〈時事選載：觀象臺提議禁用陰曆〉，《浙江警察雜誌》，第65期(1922年12月)，頁13。

²⁷ 〈張樹幟電閻錫山賈榮稱奉來同講演遵用國曆事如何處理乞示〉(1922年1月4日)，〈各方民國11年往來電文錄存(六)〉，《閻錫山史料》，臺灣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8-0037-001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4617361C9=Of6U#0bF>，讀取日期：2022年10月27日)；〈張樹幟電閻錫山賈榮稱奉來同講演遵用國曆事如何處理乞示〉(1922年1月5日)，〈各方民國11年往來電文原案(十)〉，《閻錫山史料》，臺灣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8-0448-001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46173496gcBQhT#3dJ>，讀取日期：2022年10月27日)。

²⁸ 《晨報》，1922年12月31日，第1版；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922年12月29日，頁292–93。筆者按：在《晨報》同版刊登賀卡的個人與機構有數十位，基本都是「恭賀新禧」，唯有錢玄同「國曆新年，敬祝幸福」，側面說明此時「國曆」一詞遠未普行。

²⁹ 〈國曆統一期成會已成立〉，《民國日報》，1923年3月29日，第3張，第11版；〈國曆統一期成會消息〉，《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4月8日，第4張，第4版。

1924年，張春浩(1899-?)提出要進行「國曆運動」，但應者亦寥寥。³⁰將張春浩引為同調的顧仲雍(1893-1924)，雖也贊同推行「國曆」，並擬定了八條推行「國曆」的辦法，但顧氏認為當時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政府」，³¹所以還不是政府重頒曆書的時候。

上述諸人以「國曆」指稱陽曆(西曆)，並為推行「國曆」，或發文議論，或付諸實踐；或從政府層面入手，或組織民間力量，惜均未能產生大的影響，整個社會依然把西曆稱為「陽曆」(甚至是「洋曆」)而不是「國曆」。上述名為「國曆統一期成會」的民間協會，儘管以「國曆」為名，但其所頒行章程的具體內容卻主要用「陽曆」一詞，提倡「國曆」者不用「國曆」一詞，則國曆的普行程度可以想見。³²這個情況直到1927年6月突然發生變化，也就是在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廢除舊曆，通用國曆」前一年，「國曆」一詞突然在報紙上比較頻繁地出現，並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討論。³³

³⁰ 張春浩：〈國曆運動〉，《民國日報·覺悟》，1924年1月1日，第4張，第4版。

³¹ 仲雍：〈推行國曆〉，《民國日報·覺悟》，1924年1月20日，第4張，第1版。

³² 〈國曆統一期成會消息〉，第4張，第4版。

³³ 筆者按：利用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愛如生「《申報》數據庫」、中國近代報刊「《大公報》數據庫」、「晚清和民國時期中文報紙集」等檢索相關詞條，在1927年「國曆減租」前，「國曆」一詞在報刊上的文章和新聞並不多，有國民黨背景的《民國日報》是主要刊載平台，除已提及的文章外，主要還有：〈岑總裁不信任案之前途觀〉，《申報》，1919年10月31日，第2張，第6版；〈足球比賽之更正〉，《申報》，1920年1月14日，第4張，第14版；〈津人請求廢止陰曆〉，《民國日報》，1921年1月17日，第2張，第6版；〈少年宣講團新正宣講紀〉，《申報》，1921年2月11日，第2張，第7版；徐造青：〈我業應先改用國曆之芻議〉，《錢業月報》，第1卷第10號(1921年11月)，頁8-10；〈隨感錄〉，《民國日報·覺悟》，1922年1月23日，第4張，第4版；〈黃花崗紀念改用陽歷提議〉，《民國日報》，1922年2月14日，第2張，第6版；〈李慶芳議撤清室帝號〉，《申報》，1922年7月30日，第2張，第7版；大白：〈實行國曆問題〉，《責任》，第8期(1923年1月)，頁1；顧仲雍：〈放假後的我〉(九續)，《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3月15日，第4版；寅三：〈年底年頭之間話〉，《申報》，1924年2月10日，第1張，第1版；俞慕古：〈現在之氣〉，《申報》，1925年1月30日，第3張，第12版。上述各文章對於曆法名稱的使用較為隨意，如〈黃花崗紀念改用陽歷提議〉一文，全篇「陽歷」、「新曆」、「國曆」(「國曆」)作為同義詞混用；同時，當時相當數量的文章還「歷」、「歷」、「曆」、「厯」混用，一般並不注意「歷」與「曆」的區分，本文為行文統一起見，除特殊情況外，一律寫作「曆」。

二、以西為「國」：總理志願與「二十八元房租」

1927年4月，上海同孚路大中里房客嚴諤聲，要求收租方聯華銀行從該年陽曆5月1日起改用陽曆房票收租。大中里的房租後移交給公和洋行地產部經租，嚴諤聲在該地產部收取陰曆四月房租時再次強調這一點，表示嗣後如再以陰曆收租，將概不付給房費，並正式致函公和洋行地產部。公和洋行對嚴諤聲的要求置之不理，照舊按陰曆五月收租，嚴諤聲於是拒絕付租，並在6月13日再次致函公和洋行地產部。在這通函文中，嚴諤聲鄭重談到：

民國元年，先總理中山先生建都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時，首先下令，改用陽曆為中華民國國曆。蓋時曆關係國家，最為重要，在昔以不奉正朔為不順從之證，良有以也。總理改定國曆，一方面力求世界之大同，一方面發皇民族之精神，不使迷信陰沉之惡習，永隨陰曆而存在。然元年迄今，十六年來，為舊勢力舊習慣所籠罩，總理所改定之國曆，雖通行於政界，而人民猶鮮奉行。現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國民政府既奠都於總理指定之南京，凡屬國民，對於總理改定國曆，尤宜切實奉行。³⁴

在嚴諤聲看來，曆法關係國家正朔，最為重要，所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首先下令，改用陽曆為中華民國國曆」。現在正值「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國民政府既奠都於總理指定之南京」之時，所有國民「對於總理改定國曆，尤宜切實奉行」。嚴諤聲表示他將遵用孫總理所定之國曆付租，如果公和洋行地產部繼續堅持按陰曆收租，他「惟有將租金暫為保存」，並「靜候貴部向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控訴」，倘若法院判他陰曆付租，他「自當遵照辦理」。但嚴氏同時又聲稱，如果法院判他陰曆付租，也就意味著「鄙人遵用中華民國曆為不當，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為不當」。當此「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之時，嚴諤聲高舉「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之大旗，³⁵ 仰借孫中山的旗號，則顯然具有天然正當性，其說法實則暗含威脅之意。

嚴諤聲以「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為名，要求公和洋行地產部遵照孫中山所定之「國曆」收租後，收到公和洋行的英文回信一封，該回信稱如果嚴諤聲

³⁴ 〈嚴諤聲請照陽曆收付房租〉，《申報》，1927年6月14日，第4張，第15版。筆者按：該文亦以〈請照陽曆收租〉為名，刊載在同日出版的《時事新報》報刊上。

³⁵ 同上注。

「照外國曆付租，每月須多付一元二角」。嚴謬聲所說的「國曆」在公和洋行那裡成了「外國曆」，嚴氏對此極為憤慨，他回函道：「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定都南京時所頒定，通行已十六年，來信謂如欲照『外國曆』付租云云，牛頭不對馬嘴，鄙人不敏，不知何所謂『外國曆』也。」³⁶從事實來講，公和洋行的說法可能更準確，嚴謬聲所說的國曆確係一種外國曆，至於所謂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頒定過「中華民國國曆」，本身距歷史事實甚遠。³⁷

儘管嚴謬聲帶有偷換概念之嫌，但嚴氏將陽曆視為「國曆」，並一口咬定是孫中山的看法，則自然有他的深意。他曾在6月13日的函文中談到：「陽曆陰曆，相差無多，即以鄙人所居之房租而論，每月二十八元，以陰曆較之陽曆，兩年中多付一個月，為數更屬有限。但以國曆關係，所爭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³⁸但事實卻是此時民國建立已逾十六年，在這十六年間，嚴謬聲從未「貫徹總理改曆之志願」，一直按陰曆交租，現在標榜謹遵總理遺教的南京國民政府甫一成立，嚴謬聲似乎馬上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所謂「貫徹總理改曆之志願」，恐實質是貫徹嚴氏本人的「減租志願」。儘管租金上漲，但公和洋行已同意嚴謬聲按「外國曆」付租，嚴謬聲所謂「改用中華民國曆付租」的要求已實現，但他減租的意圖卻落空，而公和洋行的英文回函恰好給了嚴謬聲口實。嚴謬聲於是再次扛起「國民革命」大旗，批評公和洋行「假借帝國主義之面具」恐嚇自己：

鄙人與大中里產主及貴行地產部經理，均為中華民國國民，居住於中國領土之內，自應使用中國文字，且鄙人住大中里已有年半，接到房東通告房票，均為華文。今乃以英文通告見寄，顯係假借帝國主義之面具，來恐嚇房客……不以本國文字與本國人商議，乃借用英文，其心何居？無怪國民革命，必須打倒買辦洋奴。³⁹

在嚴謬聲看來，公和洋行地產部「不以本國文字與本國人商議，乃借用英文」，顯係「假借帝國主義之面具」來恐嚇自己，實乃必須打倒的「買辦洋奴」。嚴謬聲

³⁶ 〈用國曆付房租之嚴正主張，大中里房客致經租處函〉，《新聞報》，1927年7月17日，第3張，第4版。筆者按：該文亦刊於《民國日報》、《申報》等報刊。

³⁷ 筆者按：從目前史料的來看，孫中山似從未稱陽曆為「國曆」，其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頒布的也是〈改用陽曆令〉，並非嚴氏所說的「中華民國國曆」。

³⁸ 〈嚴謬聲請照陽曆收付房租〉，《申報》，1927年6月14日，第4張，第15版。

³⁹ 〈用國曆付房租之嚴正主張〉，《新聞報》，1927年7月17日，第3張，第4版。

表示自己「不識文字，不怕洋人，此等伎倆，絕不害怕」，並向公和洋行鄭重提出：「鄙人所要求者，乃係不必照已經國民政府廢止之陰曆付租，而改用中華民國曆付租。」⁴⁰

嚴謬聲宣布公和洋行是必須打倒的「買辦洋奴」，並要求改用「國曆」付租，以「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但所謂「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與打倒「買辦洋奴」可能並沒有那麼重要，更關鍵的是利益之爭。陰曆十九年七閏，每兩年多即多出一個月，按陰曆付租，逢閏月即要多交一月房租，即嚴謬聲所說「欲令鄙人於二十四個月中，付租二十五次，此種計算方法，真可謂太奧妙矣」。更為關鍵的是，按照公和洋行現在的收租方式，以國曆交租的嚴謬聲，租金不降反升，「即以二年中付二十五次計算，鄙人之房租，為每月二十八元；今欲令鄙人每月多付一元二角，即一年多付十四元四角，兩年多付二十八元八角，未知此大洋八角是否作為預付閏月房租之倒貼利息，真令人莫明其妙」，⁴¹ 這顯然是嚴謬聲不能接受的。

嚴謬聲本是資深報人，又在商會中擔任領導職務，與當時的政界、商界、報界關係密切，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力，其宣傳「國曆」交租的文章同時刊載在《新聞報》、《民國日報》、《申報》、《時事新報》等大報上，引起不小的關注。加之嚴謬聲所提倡的「國曆交租」，又關係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眾多房客及房客聯合會突然變得「革命」起來，紛紛採用嚴謬聲的話語體系，也就是所謂的孫中山「改用陽曆為中華民國國曆」，虔誠地表示要「貫澈總理改曆之志願」，要求收租人一定要按「孫總理所定之國曆收租」。⁴² 其後不僅是上海開始推行「國曆交租」，各地也紛紛效仿，成為後來南京國民政府「國曆運動」的先聲，陽曆由外國曆上升為「神聖之國曆」，⁴³「國曆」一詞也就隨之普及深化。⁴⁴

因為長期參與商會事務，嚴謬聲向來關注經濟問題，很善於從經濟利益入手，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早在1921年，嚴氏就曾作為新康里房客代表向洋行

⁴⁰ 〈用國曆付房租之嚴正主張〉，《新聞報》，1927年7月17日，第3張，第4版。

⁴¹ 同上注。

⁴² 〈華興里房客之要求〉，《申報》，1927年8月3日，第4張，第14版。

⁴³ 〈法房總會通告陽曆付租〉，《申報》，1927年12月23日，第4張，第15版。

⁴⁴ 筆者按：關於嚴謬聲與上海國曆交租問題，參吳雨蔓：〈南京國民政府推行國曆運動：以上海為中心的考察〉（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磋商，要求免加房租。⁴⁵受新康里房客反增租風潮影響，經上海部分房客會建議，上海各路房客聯合會總會致函工部局，提出1922年1月起改用陽曆交租。⁴⁶這項動議最後未克實現，但嚴謬聲作為當時新康里房客代表與房客總會領導，對於陽曆交租的益處與一般租客的利益訴求，早已瞭然。

在嚴謬聲號召國曆交租的同時，上海租界擬增加巡捕捐，嚴氏是當時「市民反對增加房捐大會」的重要參與者，該會宣布遵照國民黨的政策指導與參加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之任務」為最大之使命。⁴⁷從後見之明來看，所謂國曆交租，不單是宣傳口號，嚴謬聲一系列活動的背後，是有意識地與在滬洋人競奪各種經濟利益，乃至借機打擊帝國主義與收回租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上海舉行商民慶祝大會，嚴謬聲作為該會七位主席之一，聯名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賀電，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主權、撤退各國駐華海陸軍、撤除租界周圍障礙物、廢除苛稅雜捐、提倡國貨、協調勞資糾紛等多項建議。⁴⁸此後，嚴謬聲不但提倡國曆交租與反對上海租界增加巡捕捐，還擔任上海勞資調節委員會秘書長與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委員。這些建議的提出與嚴謬聲此後的具體實踐，很難說不是有意為之。

此外，當時的嚴謬聲與潘公展(1894–1975)同住大中里，二人關係密切，同時提倡國曆交租，嚴謬聲一系列舉動的背後，有潘公展乃至國民黨的授意，亦不無可能。⁴⁹不論嚴謬聲提倡國曆背後最真實的動因為何，是否如其所標榜的「貫徹總理改曆之志願」，但嚴氏以孫中山的名義，宣布陽曆為「國曆」，將其作為國家正朔、民族精神與世界大同的象徵，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⁵⁰嚴氏的這套提倡國曆的話語體系，適應了此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需要(甚至可能本就

⁴⁵ 〈恐慌聲中之加租問題〉，《新聞報》，1921年10月3日，第4張，第2版。

⁴⁶ 〈加租聲中之房客〉，《時事新報》，1921年11月30日，第3張，第1版。

⁴⁷ 〈市民反對增加房捐大會〉，《民國日報》，1927年6月24日，第3張，第1版。

⁴⁸ 〈上海商民慶祝大會請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稅自主電〉，《國民政府公報》寧字第2號，1927年5月11日，頁26。

⁴⁹ 玄玄：〈潘公展嚴謬聲同盟抗租〉，《血滴子》，1928年4月11日，第2版。

⁵⁰ 筆者按：早在1924年，柳亞子即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毅然決然，廢止太陰曆，把太陽曆定為國曆」，不過柳氏的文章發表在地方小報，常人不易得見，發表的時機也有別於嚴謬聲，影響自然也不如。參佐藤仁史：《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與地域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65。

出於其授意)，後來基本為南京國民政府吸收借鑒。所謂國曆關係國家正朔；推行國曆有助於與世界接軌和發皇民族精神；陰曆代表迷信陰沉之惡習，是舊勢力舊習慣的象徵；民國國民，居中國領土，應使用中國文字，改用中華民國曆等言說基本被南京國民政府照搬，甚至嚴諤聲將阻礙推行國曆者稱之為「帝國主義」、「買辦洋奴」的做法，也被吸收借鑒。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此後即以「實行國曆是遵行總理的遺志」為宣傳國曆的口號，⁵¹於是所謂孫中山「改用陽曆為中華民國國曆」的說法，⁵²似也由想像成為現實。

其實陰曆交租問題很早就有人關注到，早在1920年，就有人談到：

社會上還有一種因為並用陰陽二曆不公平的事，就是在政府機關、學校及洋行辦事的人，他們得薪水是遵着陽曆，至於他們出的房租及用人的工資，又照着陰曆，所以每到閏月的時候他們就吃虧不少呢，實在五年以內要多出兩個〔月〕的錢，這冤不冤呢？⁵³

但此類文字刊出後並無實際影響，尋求陽曆交租的意圖亦未實現，嚴諤聲的國曆交租卻獲成功，在講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中國，似乎「名正言順」的國曆，甫一開始就顯示出它的威力，再加上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力倡導（乃至強制推行），以國曆取代陰曆的時代似已隱約可見。但歷史的弔詭之處正在於此，當時部分人的眼中「國曆」其實並不是那麼「名正言順」，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時人對「國曆」涵義的認知也遠未達成共識。

三、「國曆」亦非西曆：蔣介石等人的認知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當時中國同時存在著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北京政府三個分庭抗禮的政權。時曆關乎正朔，向為統治權的象徵，與國家節日慶典、生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構建社會政治秩序中發揮

⁵¹ 〈中央宣傳部電告元旦宣傳要點〉，《申報》，1928年12月28日，第4張，第13版。

⁵² 〈國曆收租又一函〉，《民國日報》，1927年9月9日，第4張，第2版。

⁵³ 嚴少懷：〈究竟是陰曆適用還是陽曆適用〉，《申報》，1920年9月1日，第4張，第16版。

著重要作用。⁵⁴為爭奪國家正朔、革命正統並與世界時間接軌，以「謹遵總理遺志」自命的南京國民政府，將劃一時政視為塑造政治權力來源正當性的重要工具之一。⁵⁵據曾親歷南京國民政府的首部曆書——《中華民國十七年國民曆》編訂工作的陳展雲(1902–1985)所言：

三個政府各以合法的中央政府自居，其中，南京政府成立最晚，法律根據最薄弱，爲了提高它的威望，凡有助於粉飾自己合法性的措施都積極採取，由於頒曆在歷代都被視爲統治權的象徵，這就是很早建立起「時政委員會」這個機構和編製、頒布《國民曆》的由來。⁵⁶

而時政委員會為「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還「特於曆書每頁下幅，刊載總理遺訓，以期窮陋僻壤，盡沐黨化」。⁵⁷

此後，南京國民政府又於1928年發起「國曆運動」，並由宣傳部、內政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等部門會同辦理。以陽曆為「國曆」終由民間的議論與設想，變為由政府推動而成的現實。以此而論，蔣介石(1887–1975)及其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國曆」一詞的普行及《國民曆》的產生密切相關，然而蔣介石本人對「國曆」的認知似乎與一般不同。嚴諤聲等人所言的國曆即陽曆，蔣介石眼中的國曆卻似並不完全等同於陽曆。

1934年3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向各省市政府發布諮文，要求「各種書刊封面，報紙題字標語等，概不准用主體陰陽花色字體及外國文，而於文中中國問題，更不得用西曆年號，以重民族意識」。這項指令先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政治訓練處以「奉委員長蔣諭」為由，要求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照核辦」，中央宣傳委員會轉請內政部「轉諮各省市政府，飭令各報社雜誌社

⁵⁴ 筆者按：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政治與曆法關係極為密切，如唐代僧一行(683–727)改曆與郊祀、封禪等重大禮儀活動密切配合，共同支撐起唐玄宗對李唐政權合法性的重新構建，參郭津嵩：〈僧一行改曆與唐玄宗制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3本第2分(2022年6月)，頁367–407。

⁵⁵ 朱文哲：〈科學與「黨義」：國民曆編訂的爭論及其意蘊〉，《人文雜誌》2018年第7期，頁99。

⁵⁶ 陳展雲：《中國近代天文事蹟》，頁33。

⁵⁷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下冊，頁1400。

遵照」。⁵⁸隨後，南京、北平、上海、青島等特別市及江蘇、浙江、河南、河北、江西、安徽、廣東、察哈爾、山東等省政府先後傳達了這一指令。以此而言，這一辦法無疑是出自蔣介石的手筆，充滿了文化保守主義氣息。

對於「不得用西曆年號」一事，胡適(1891–1962)明確表示不贊同，他於1934年4月4日委託從南京到南昌的蔣廷黻(1895–1965)帶信給蔣介石，勸其「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並表示「今日之事，適得其反，名為總攬萬幾，實則自『居於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⁵⁹由於阻力過大，數日後，蔣介石在南昌演講時專門解釋道：

前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國文字年號，係命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而政訓處竟送中央宣委通令全國，實屬荒謬。我蔣介石非中央黨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給中央宣委會，且通令全國，豈非笑話。望各職員以後辦事，務須認清系統，明白手續，方能為在上者分勞，不致將事辦錯！⁶⁰

胡適對此評說到：「此事可見他不是不能改過的人，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他的過舉。」⁶¹

不論此令是否出於「政訓處」的自作主張，但蔣介石並不認為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執行「不得用西曆年號」的命令有何不妥。在此「國曆」大行其道的時代，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一面大力推行「國曆」，一面又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不得用西曆年號」，則依蔣氏之意，所謂國曆並非西曆(陽曆)，抑或說國曆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曆？雖然當時的「國曆」的確並非簡單照搬西方的「陽曆」，

⁵⁸ 〈諮各省、市政府：諮請轉飭各出版品發行在各種書刊封面等概不准用主體陰陽花色字體及外國文而於文中中國問題更不得用西曆年號〉(1934年3月8日)，《內政公報》第7卷第10期(1934年3月)，頁466。筆者按：這一命令中，「主體」二字當為「立體」，內政部後又發文更正，見〈更正法令事項：諮各省、市政府：關於各種書刊封面報紙題字概不准用主體陰陽花色字體一案「主體」二字係立體之誤諮請查照〉(1934年4月12日)，《內政公報》第7卷第15期(1934年4月)，頁753。

⁵⁹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7冊，1934年4月4日，頁93–94。

⁶⁰ 〈南昌行營紀念周：蔣講述贛中軍民秩序良好，禁用外文年號係令政訓處〉，《中央日報》，1934年4月10日，第1張，第2版。

⁶¹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7冊，頁97。

不但紀年延續傳統模式，按「民國紀年」，還試圖移植傳統節日於其中，有著本土色彩。⁶²但不可否認的是，「國曆」的主體為西曆，並不是易之以「國曆」的名號就可改變，蔣氏對於「西曆」那種不得不用而又心存排斥的複雜心態表露無遺。

蔣介石所不知道的是，當時中國因為條件限制，並不能獨立推算曆書，不論是北京政府的官曆，還是國民政府的國曆/國民曆，都是根據外國提前出版的天文年曆改算而來，⁶³「國曆」本質上就是「洋曆」、「西曆」、「外國曆」，不論是推算方式還是具體內容，「西洋」的因素很重。雖然蔣介石對此問題的相關見解在當時既不新鮮高明亦很零散，但其在當時中國的獨特政治地位，社會影響不能夠低估。⁶⁴

幾年後，有關部門又故態復萌，1939年7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通函全國各級黨部轉飭各地報紙刊物社，再次強調「記載本國最近事件，須用民國紀元」，不過此時態度已經緩和了許多，允許「必要時，可將西曆紀元，附於本國紀元之後，並加括弧」。⁶⁵1942年，蔣介石再度要求紀年應「用中華民國某年字樣」，不過這一次不再是針對「西曆年號」，而是有鑒於「民間紀年方式，間有略去國號，或仍用干支紀年者，殊非尊奉正朔之意」。⁶⁶值得附帶提及的是，「中華民國」四字為當時各方爭奪與利用，如抗戰時代王克敏(1876–1945)領導的政權雖與蔣介石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敵對，但也曾要求政府各機關及中國法人資格之公司，

⁶² 關於國民政府移置舊曆節日於國曆體系的相關情況，參王建軍：〈「誅影以滅形」：南京國民政府與舊曆節日改造〉，《民國檔案》2022年第3期，頁80–91。

⁶³ 陳展雲：《中國近代天文事蹟》，頁90–91。筆者按：天文年曆即《航海通書》，關於當時製曆機構購買航海通書的情況，參〈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結購外匯購置外國書刊儀器文書〉(1939年1月–1944年12月)，《中央研究院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393-1858(1)。

⁶⁴ 筆者按：如在1933年，鐵道部便要求「聯運行李包裹聯票據所列品名、站名，應用中文填寫，其日期以中華民國紀元為標準」，見〈鐵道部訓令：令各聯運鐵路管理局：聯運行李包裹票據所列品名站名應用中文填寫其日期以中華民國紀元為標準由〉(1933年12月19日)，《鐵道公報》第743期(1933年12月)，頁1。

⁶⁵ 〈記載中國近事應用民國紀元，中宣部飭各刊物社周知〉，《晶報》，1939年7月11日，第4版。筆者按：《申報》、《錫報》、《力報》、《新聞報》等報刊亦紛紛轉載了此消息。

⁶⁶ 蔣中正：〈訓令：令各部會署、省市政府：為民間契約簿據紀年應冠以中華民國四字仰遵照由〉(1942年1月27日)，《行政院公報》第5卷第1號(1942年1月)，頁49。

對外文函務用中國文字及中國紀元。⁶⁷至於抗戰時代成立的汪精衛國民政府，更是在曆書的製作與頒發、曆書的形式與內容等諸多方面延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舊例，並與蔣介石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相對立，彼此競爭。

蔣介石等人所謂國曆亦非西曆的觀點，在當時似頗有市場。⁶⁸陶夢覺（生卒年不詳）1924年所作〈二十年中外大事紀略〉是目前較早使用「國曆」進行年份標示的文章，但與一般想像的不同，其按西曆與「國曆」對舉的方法標示每年大事，如1903年標為：西曆：一九零三年，國曆：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12年則標為：西曆：一九一二年，國曆：中華民國元年（壬子）。⁶⁹陶氏的「國曆」反而是一種民國紀年（晚清部分則為皇帝年號紀年）與干支紀年的結合體，本為西曆的國曆，在曆書上卻出現了「國曆」與「西曆」對應乃至對立的情況，陶氏的這種「國曆」認知，也顯示出「國曆」的豐富內涵。

陶氏的做法在當時並不稀見，陳濤（生卒年不詳）於1934年出版了《日本政界要人評傳》，是書附有〈國曆西曆日本曆對照表〉，當時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曆已有數年，然而該書的國曆一欄卻標示為：道光某某年、咸豐某某年、同治某某年、民國某某年等，並與日本曆、西曆時間相對應。⁷⁰在陳濤看來，「國曆」為民國紀年或皇帝年號紀年，且不完全等同西曆。對於國曆的中西雜糅，有人認為，正因為「我們所定的國曆，雖採取陽曆為標準，而陰曆所用的二十四節令，仍不排除，熔陰陽曆的長處在一爐」，國曆反而是「一種最完美的曆法」。⁷¹時人的這些觀點與國曆的中西雜糅，凸顯出國曆一面既試圖接續民族國家的時曆傳統，一面又不得不與世界時間相統一的矛盾。

⁶⁷ 余晉蘇：〈訓令：訓令七局一處：奉行政委員會令本政府各機關及中國法人資格之公司對外文函務用中國文字及中國紀元令仰遵照由〉（1939年8月1日），《市政公報》第58期（1939年8月），頁1。

⁶⁸ 筆者按：甚至嚴譔聲的觀點與蔣介石亦有相似之處，嚴譔聲反對將國曆稱為「外國曆」，蔣介石則認為國曆不是西曆，二者均強調國曆的本土性。

⁶⁹ 陶夢覺：〈二十年中外大事紀略〉，《興華報特刊》，第21期第1冊（1924年1月），頁157-96。

⁷⁰ 〈國曆西曆日本曆對照表〉，收入陳濤：《日本政界要人評傳》（上海：機杼出版社，1934年），頁1-2。

⁷¹ 黃影呆：〈推行國曆〉，《民國日報》，1931年2月17日，第3張，第2版。

此外，雖然政府大力提倡用民國紀年，但早就有人批評民國紀年是延續皇帝年號紀元，「脫不了舊時窠臼」。⁷²至於所謂蔣介石所憂慮的「正朔」問題，根本就不能成立，早在1927年，曆法專家高魯就指出，所謂「採用公曆，即是奉西人之正朔，並且成為西人之屬國」的說法，不過是「過甚之辭」與「畛域之分」，為近世科學所不容，況且陽曆不定朔望，只計月令，「正朔二字，不能在西文字典中覓得之」。⁷³

當時部分報刊在傳達蔣介石命令時還增加私意，《大公報》在內政部的公文外又增加「令洋紙一律禁用、以提倡本國紙張」等內容。⁷⁴以國曆對抗（取代）西曆，以國貨（本國紙張）對抗（取代）洋貨（洋紙），以重民族意識；然而國曆的主體仍為西曆，國貨實為洋貨，所謂本國紙張，實際也是採西法而製造。那是一個蔣介石等人提倡「民族意識」，排斥「洋文」、「洋曆」的時代，為重「國體尊嚴」，就連運動上衣的「外國文字標識」也必須取締，⁷⁵法幣背面的外國文字也需取消。⁷⁶在這樣一個時代，仿印「國曆」的紙張必須用國貨，⁷⁷甚至「用阿剌伯文字表示陽曆日期」，都會「使人留了一種陽曆是外國曆，陰曆是中國曆的很深印象」。⁷⁸但當時的「國曆」反而不是「國貨」，「西曆」作為一種「洋曆」，竟可以鳩佔鵲巢，成為「國曆」。以此而言，是蔣介石等國民黨要人並未意識到「國曆」本為「西曆」，「國曆」實為當時國字號事物中的異類，所以會心安理得地接受並推廣「國曆」，還是別有緣由？時人眼中的「國曆」到底是中曆還是西曆？抑或是所謂「熔陰陽曆的長處在一爐」的特殊曆法？

⁷² T.P.：〈世界曆法〉，《東方雜誌》第26卷第12號（1929年6月25日），頁92。

⁷³ 高魯：〈國民曆釋疑〉，《中國天文學會會報》（1927年），頁86。

⁷⁴ 〈著作家、出版界注意〉，《大公報》，1934年3月28日，第1張，第3版。

⁷⁵ 〈教育部訓令：為通令取締學生運動衣上濫用外國文字標識〉（1931年10月2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5626(2)。

⁷⁶ 〈行政院交財政部議案通知單：軍事委員會函為嗣後印刷法幣應取消背面之外國文字改用本國文字請迅予改正由（附原函）〉（1941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財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3(6)-865。

⁷⁷ 筆者按：1931年，內政部與教育部公布的「仿印國民曆辦法」第五條明確規定「仿印本之紙張，須用國貨」，見〈仿印國民曆辦法〉（1931年7月18日），收入教育部參事處編：《教育法令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輯，頁112。

⁷⁸ 潘公展：〈推行國曆廢除舊曆的工作〉，《上海黨聲》，1930年1月1日，第1版。

新朝肇建，變更正朔，改用新曆，頒行天下，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政治文化傳統。在傳統王朝走向近代國家的歷程中，曆法制度既需要與世界（西洋）接軌，以宣示立新的統治意志，又不能不維護民族國家的傳統和獨特性。國民政府告別往昔王朝，自許為當時中國的合法性代表，就其建國意識形態而言，國曆和陽曆的差異，重點不在日期的推算方式，而在於紀年方式。也就是說，「國曆」的「國」不代表往昔中國，而是國民政府主導下的中華民國，其最為顯著的標識為「民國紀年」。然而這一考量，忽視了當時國字號事物的通用含義與「國曆」可能具有的複雜多歧的內涵。實際上，當時的「國曆」至少具備國家、國故、國民三重內涵。

四、國家、國故、國民：「國曆」與《國民曆》

前述〈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一文，是目前所見最早闡釋「國曆」義涵的文章，其開篇便明確談到：

甚麼叫國曆？就是國家頒布的曆法。原來我們中華民國底曆法，在民國元年的時候，經臨時參議院通過，奉大總統命令發表出來的。按法律上的實質和形式看來，都是已經完全的了，所以叫作國曆。至於普通人或者叫他作陽曆，因為我們中華民國底國曆，用的是太陽曆的緣故。⁷⁹

「國曆」是指國家頒布的曆法，不論其陽曆抑或陰曆，這大約是最初給予陽曆以「國曆」名號者的看法，其後也延續下來，加上嚴諤聲等人的宣傳普及，成為南京國民政府和部分支持「國曆」者的主要看法。

國曆「就是國家頒布的曆法」，此類觀點顯然是把國曆視為與國旗、國歌同質的近代國家產物，即國家頒行認可的事物即能冠以國字號名目。⁸⁰在時人看來，把陽曆改為「國曆」可以引起大眾的注意，因為「國曆的國字，是代表國家的意思」，全體國民必須一體遵照奉行，不然就是「看輕國家反對國家」，所以「陽曆換了個國字，意義極其豐富」。⁸¹當時負責國曆推廣宣傳的黨政機關亦持有

⁷⁹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第2版。

⁸⁰ 筆者按：關於近代中國國旗、國歌的研究，參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⁸¹ 折箕：〈國曆和廢曆〉，《松報》，1933年1月23日，第4版。

類似的觀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即認為「國民政府尊奉總理遺訓，通令廢除舊曆，通用陽曆，同時規定陽曆為中華民國之國曆」。⁸²一份在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廢除舊曆，通用國曆」不久後出版的民間曆書，也將「國曆」定義為：「國民政府通令，改陽曆為國曆」。⁸³此類認知和思路與最初發起者相一致，只是頒定「國曆」的主體由曾經的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變為國民政府。

對於曆法名號的變換，有學者認為人們對推行陽曆並將它定為「國曆」並沒有太多異議。⁸⁴但揆諸相關史實，時人對陽曆取得「國曆」名號，並非沒有異議。高魯是當時天文曆法領域的權威人士，他對「國曆」一詞明確表示異議：「國曆之名稱，不甚恰當。國曆似係本國獨有之曆法。不如用國民曆，則可以國民政府所採用之曆解釋之。」⁸⁵在高魯看來，「國曆」應是本國獨有之曆法，唯有陰曆可稱之為「國曆」，至於以陽曆為主體而編訂的官定曆書，高魯認為稱其為「國民曆」更為妥當。作為北京政府時期與國民政府初期曆書頒製的主要領導者，高魯在回顧民國曆法演化時明確說過：「民國元年，採用此曆，謂之為公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改名為國民曆。」⁸⁶在高氏看來，「國民曆」才是國民政府所頒布曆書的正式稱謂。

在那個一切都要冠以「國民」的時代，政黨的名字為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為國民革命軍，所建立的政府為國民政府，所從事的事業也標榜為國民革命，其頒行的曆法自然也應稱之為「國民曆」。⁸⁷「國民曆」與「國曆」比較而言，前者似更

⁸² 〈中央宣傳部編訂的國曆(附圖)〉，《革命前鋒》第12、13期(1929年3月)，頁23。

⁸³ 《新世紀國曆萬年書》(東方國曆研究社，1929年)。類似的觀點很多，參蔣民：〈國曆與廢曆〉，《農村月刊》第3期(1930年1月)，頁4；龔理天：〈國曆和廢曆〉，《江西地方教育》第76期(1937年1月)，頁18。

⁸⁴ 左玉河：〈擰在世界時鐘的發條上：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頁156。

⁸⁵ 陳展雲：〈最近一年中國內之改曆運動及普及國曆運動〉，《中國天文學會會報》(1928年)，頁24。

⁸⁶ 高魯：〈國民曆釋疑〉，頁86。

⁸⁷ 筆者按：關於民國時期的「國民」塑造，亦即「民國國民」(Republican Citizen)的觀念是如何通過新政治文化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一般民眾的國族認同和價值觀，以及國民黨政權試圖將「國民」轉化為「黨員」等問題，參He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符合當時國民政府的命名規則，也更不容易出現歧義，引起誤讀錯解。因此，從1927年開始，不論是高魯等專家領導下的時政委員會，還是後來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乃至抗戰時代汪精衛政府制定的官定曆書，其正式名稱一直是「國民曆」，而實際負責曆書審核和頒發的教育部、內政部，所用公文函件也都使用「國民曆」這一稱呼，整個國民政府時期均未改易。⁸⁸

這並不是高魯的一家之言，當時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陳遵媯(1901–1991)也是天文曆法研究領域的權威人士，陳遵媯不但是南京國民政府第一部曆書《中華民國十七年國民曆》的主要制定者，此後歷年的《國民曆》及其簡本《國曆摘要》也基本上由其負責推步編製。陳氏奉命向民眾作〈國曆的好處〉的演講時明確表示：「我個人的意見，現行曆法，並不是我們中國自己所創造，以別人所造的曆法叫為國曆，不甚妥適」，只不過現在「中央黨部已定名曰國曆，所以本人仍以國曆呼之」。⁸⁹陳遵媯本不贊同以「國曆」指稱現行曆法(陽曆)，但因這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意見，陳氏只得遵從。

當時的黨政當局在宣傳「國曆」時也說「奉行國曆，是國民應有的義務」，並號召大家「一致口不談舊曆，目不看舊曆，心不念舊曆，而化為尊奉總理遺教的新國民」。⁹⁰從這個層面而言，「新國民」必須尊奉的曆書，當然名之曰「國民曆」更合適。嚴格來說，「國曆」與「國民曆」最初本是形似而實不同，甚至按高魯與陳遵媯之意，兩者不但不同，甚至相反。奉命推行國曆及實際制定曆法的專業人士，雖不甚贊同「國曆」這一稱謂，惟他們的「個人的意見」似乎並未得到重視，「國民曆」最後僅能指代國民政府每年頒行一次的曆書，「國曆」一面與「國民曆」混用，既可指代國民政府頒行的官定曆書，又幾成「陽曆」之同義詞，指代曆法，其內涵與外延都更加複雜。

同時，這些專業人士雖不甚贊同以「國曆」指稱陽曆，但是面對民間質疑之聲時，還是不得不替有關部門解釋以「國曆」指稱陽曆的合理性：「國曆一詞，

⁸⁸ 僅舉一例：〈一九三九年國民曆編印及分送案〉(1938年5月–1938年7月)，《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12(6)-16425。

⁸⁹ 陳遵媯：〈國曆的好處〉，《申報》，1935年11月16日，第3張，第9版。

⁹⁰ 〈各界應奉行國曆，六區黨部高民眾書〉，《民國日報》，1928年12月28日，第2張，第4版。

原係中央所頒布，數年以來，社會慣用已慣，敝所本『約定俗成』之誼，亦主無需修改。且就字義而論，國曆可詮釋為『國家現行曆法』，原不必限定用『本國自創之曆』之狹義的訓話。」⁹¹

曆書及曆法政策的制定者，雖能辨別「國民曆」與「國曆」孰為正式稱謂，但負責曆書推行的地方有關部門，大多數時候卻並不能清楚辨析「國曆」、「國民曆」及其相關概念，推行者即為誤用者。1942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八區黨部致函內政部，以「為推行國曆起見」為由，希望內政部「將三十一年度國民日曆，檢賜十本」，以便「供眾溜覽，期收普遍推行之特效」。⁹²嚴格說來，該黨部所求「國曆」、「國民日曆」之書並不存在，內政部給該黨部回函使用的也是「國民曆」一詞，不經意間糾正了該黨部的謬誤。⁹³

魯迅(1881-1936)曾將「國粹」定義為：「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改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⁹⁴當時中國的國字號事物大都如此，為中國所固有乃至所獨有。同時，彼時國學、國醫等國字名號充斥國內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字號事物的「國」字含義至少在部分人的認知中似已是常識。把西曆命名為「國曆」，在當時極易讓人誤以為「國曆」係本國固有曆法。不僅高魯、陳遵媯等專家已意識到這一點，當時還有不少人也認為以陽曆為「國曆」很不合適，「什麼推行國曆，那不過是抄襲外來的東西」，⁹⁵「西曆而為國曆，不啻以洋裝為國服，以洋貨為國貨」，⁹⁶「明明叫陽曆，歐美各國公共採用的，而中國偏偏叫做國曆，像一個國家專有一樣，豈不可笑得很」。⁹⁷

⁹¹ 〈中央研究院致教育部函：函復准送蔣士棟關於置閏之意見及原附件已據天文研究所審查認為意見陳舊不能採用希查照轉知由(附天文研究所審查報告)〉(1931年2月3日)，《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第2卷第8期(1931年2月)，頁66-67。

⁹²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八區黨部為請發給國民日曆十份事致函內政部〉(1942年1月6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12(6)-16428。

⁹³ 筆者按：此類情況並不稀見，1937年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致函內政部，索要曆書時，也是如此，見〈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為請發給廿七年份國曆書表事致函內政部〉(1937年10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檔案號：12(6)-16424。

⁹⁴ 唐俟：〈隨感錄(三五)〉，《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頁513。

⁹⁵ 落漠：〈舊曆除夕的追憶〉，《大公報》，1930年2月12日，第4張，第15版。

⁹⁶ 逸：〈社評：國醫與國曆〉，《社會醫報》第150期(1931年9月)，頁2277。

⁹⁷ 折箕：〈國曆和廢曆〉，《松報》，1933年1月23日，第4版。

政府提倡「國曆」新年，但民眾眼中卻還是「中國人吃洋飯，穿洋服，上洋學堂，還要過洋年」，簡直要到「洋人國裏去」了。⁹⁸

1930年年末，《真美善》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名為〈廢曆新年在新都〉的文章，該文不無諷刺地寫道：

「夏曆」，據說是已經廢掉了；這只消我們把它的新名字——廢曆——拿來嚼一嚼就可以曉得。在這「國」字大出風頭的時候，執政諸公竟敢在民眾面前喝倒彩，要把這帶着「國」的色彩很濃厚的「夏曆」廢除，我們不能不佩服諸公的「大無畏」；雖則在另一方面，我們又見到諸公提倡「國曆」，維護「國醫」，「喝倒彩」並不儘然。⁹⁹

該文作者意識到在「『國』字大出風頭的時候」，本國獨有的「夏曆」（陰曆）才是國曆，政府一面提倡「國醫」，一面又廢除「夏曆」，讓人心生困惑。

如果說上述諸人意識到以「西曆」為「國曆」，在稱謂上有所不妥，容易引起誤會，那麼黃竹齋（1886–1960）則認為把現行陽曆作為「國曆」名實不符。因為國曆是「適用於本國之一種特殊曆法也」，這種曆法「當依據本國每歲氣候之變化，陰陽之消長，寒溫之升降，紀綱一歲天運之行率，規定四時日月之節令，以供農業之應用，參考歷史之沿革，以合民情之習慣，作國人乘時驅事赴功之程序」。同時因為世界各國「南北寒溫不同，海陸高下各殊，以及宗教風俗，種種殊異，適於甲國者，未必即適於乙國」，所以國曆要「適用於本國」而「不必求同於他國」，不然只會「欲求兩得，至兩失」。黃氏暗示當前使用的西曆不適合作為國曆，並進一步指出「以前我國通用之陰曆，其法完全創制於吾國，是可稱為過去時代之國曆」。在黃竹齋看來，陰曆是過時的「國曆」，陽曆是名實不符的「國曆」，所以應該改進當前的「國曆」，即把過時的「過去時代之國曆」（陰曆）適用當前中國的地方融入未來的國曆（陽曆）。質言之，黃竹齋認為當前沒有「國曆」，近代中國的國曆必須既適合國情，又要與世界接軌（也就是中西曆結合）。¹⁰⁰

⁹⁸ 思夷：〈陽曆年〉，《大公報》，1930年1月9日，第4張，第15版。

⁹⁹ 嚴元章：〈廢曆新年在新都〉，《真美善》第7卷第2號（1930年），頁331。

¹⁰⁰ 黃竹齋：〈修訂國曆芻言〉，《竹齋叢刊》（西安：西京西山書局，1936），卷下，頁1上。

署名牟烈猷(生卒年不詳)的〈國曆和廢曆〉一文,觀點與黃氏相類。該文既認為「無論今古中外稍具文化的國家,莫不各有各的國曆,以供國民的採用」,也就是「國曆」須是適應本國國情的曆法,又以為「國曆是要全國國民一致遵行的,方名稱其實,如果是僅屬少數人遵行便叫做國曆,就覺得失去命名的真意。現在雖可強稱國曆,就屬是名義上的」。¹⁰¹按牟烈猷之意,只有陰曆是過去的「國曆」,現在則陰曆、陽曆都不是國曆。在時人看來,所謂國曆必須是「我國要國人一致使用,所以叫做國曆」。¹⁰²

儘管時人對「國曆」認知不盡相同甚至對立,但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法律規定,國家頒行的曆法即是「國曆」,國曆的「國」字,代表的是「國家」之意,與國旗、國歌同質;二、「國曆」應當是本國所固有(獨有)的曆法,是「本國自創之曆」,與國學、國醫、國術同質;三、「國曆」是符合本國環境(包括自然與社會環境),並被國民廣泛使用的曆法,陰曆是過去的國曆,現在還沒有名實相符的國曆。

揆之國曆的相關概念,所謂本國所固有(獨有)曆法,更多的是試圖接續民族國家的傳統時曆,是以中(舊)為國;所謂國家頒行的曆法,則意味著建設一個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國家時間秩序,乃以西(新)為國。國故與國家的緊張,國曆涵義的多歧,顯示出近代中國的國曆構建,是在民族時曆傳統與世界統一時間的複雜張力下展開。

在民國以前,大約只有以陰曆為「國曆」才會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條件:陰曆本就是中國舊有曆法,又在當時大致適應國情,被官民廣泛使用,且由朝廷命欽天監等國家機構制定並頒行全國,為一種法定曆法。因而在「國曆」名號未得到政府正式承認並推廣之前,就有人說:「現在的所謂陰曆,也就是從前的『國曆』」。¹⁰³不過,時人對「國曆」的看法本就不盡相同,對當時「國曆」的認知與界定也遠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清晰,以上三種觀點也並不是截然分開。所謂「國曆」與「國民曆」的各自義涵,除高魯、陳遵媯等專家外,時人也並不能清楚辨析。看似標準統一的「國曆」概念,實際上表述者各有心曲,各說各話,言人人殊,

¹⁰¹ 牟烈猷:〈國曆和廢曆〉,《古定先鋒》(1930年第9期),頁29-31。

¹⁰² 清泉:〈國曆和廢曆〉,《江蘇廣播週刊》第21期(1937年1月),頁9。

¹⁰³ 胡同光:〈談陰陽〉,《時事新報》,1925年2月7日,第3張,第2版。

呈現多方言說(力量)拉扯的情勢。在各方論述競逐下成形的「國曆」,也就從一個近乎空洞的概念符號,成為正反各方自由取用的理論資源,展布出傳統時曆與世界時間的競合拉扯關係。

同時,因國民政府推行的《國民曆》在時曆內容外,還有很多政治宣傳的內容,造成曆書過厚,仿印成本增加,而且頒曆機關審核頒布曆書程序繁瑣,以致曆書印刷頒布時間常常愆期。有鑒於此,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每年頒行《國民曆》之前,製成《國民曆》的簡本《國曆摘要》(僅一頁),以供商民仿印。¹⁰⁴但作為實體曆書的《國曆摘要》可以是《國民曆》的簡本,¹⁰⁵二者均指以西方陽曆為主體的政府頒制的官曆。作為概念的「國曆」卻不可簡單視為「國民曆」的簡稱,「國民曆」僅指代國民政府頒布的法定曆法,「國曆」的內涵則豐富得多。正如傅斯年(1896–1950)所提示的那樣:「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¹⁰⁶概念複雜含混的從來都是「國曆」,「國民曆」則相對清晰簡明,國民革命軍可以簡稱「國軍」,國民政府可以簡稱「國府」,但「國民曆」卻不可輕易簡稱「國曆」。

五、「西曆中源」與中國「陽曆史」構建

梁啟超曾高度評價辛亥革命,認為既然已「掛上的民國招牌」,那麼「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不會卸下」,並反對所謂民國「只有空名並無實際」的說法。在梁氏看來,有「名」必會有「實」,即所謂「古語說得好:『名者實之賓。』凡事能夠在社會上占得個『正名定分』,那麼,第二步的『循名責實』,自然會跟著來」。¹⁰⁷就名實關係而言,梁啟超的認知相當卓越,即以「國曆」名號而論,果然一語中的。

¹⁰⁴ 筆者按:關於《國曆摘要》的編製緣起,參〈天文研究所為變更領發國民曆摘要辦法致內政教育兩部公函〉(1943年6月28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12(6)-16429。

¹⁰⁵ 筆者按:有時《國曆摘要》在政府公文中也稱《國民曆摘要》,見〈內政部為天文研究所函請變更領發國民曆摘要辦法等事致教育部公函〉(1943年8月10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12(6)-16429。

¹⁰⁶ 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2集第13期(1928年1月),頁320。

¹⁰⁷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2年10月),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冊,頁407。

以西曆為「國曆」之時，正值眾多國字號事物流行之年代，「國曆」這類名號極易引起誤讀錯解，所以像高魯這樣的專業人士認為將陽曆命名為「國曆」不甚妥當。既然時人已意識到把西曆命名為國曆，是「以洋貨為國貨」，在當時比較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下，為何很多人依然能夠坦然接受這種「以西為國」的做法？根據前述「國曆」的三重義，最大的問題在於讓人接受「國曆」是指中國固有的曆法，其他如「國曆」是指國家頒布的曆法本就已事實，「國曆」是指符合本國環境並被國民廣泛使用的曆法，則經過一定努力後，仍有實現的可能。唯「國曆」是中國固有的曆法這一點，並不是努力就可以實現。

「國曆」的三重義中，「國故」與「國家」在涵義上相對立，二者關係緊張。但概念上的針鋒相對，並不意味著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沒有折衷的空間，「陽曆史」的構建即試圖彌合「以西為國」學理上的缺失。當時中國，中西強相比附之風頗盛，「無論西洋什麼學說到中國來，總要加上一重彩色，弄得不清不楚」。¹⁰⁸值此格義比附的時代，歷史雖無法改變，但可以改寫與建構，如高魯所預料的一樣，後來果然有人把國曆視為中國固有之曆，並不斷論證其合理性。

前述牟烈猷的〈國曆和廢曆〉一文，分析了一般老百姓堅持用舊曆的原因：「舊曆沿用這麼久，打開一本通書便曉得四時八節，極便利於農事，怎麼要拿西曆來做國曆？」有鑒於此，該文特別向老百姓普及中國國曆的歷史：

你們祇知用舊曆有通書便知節氣，不知用國曆沒有通書也知節氣，祇知國曆同於西曆，不知到〔道〕國曆是我國原有的日曆。《黃帝內經》那篇〈至真要大論〉有一句話說：「歲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王冰還注明凡四年約多一日，那不是現在國曆所定的太陽曆嗎？黃帝到現在已四千六百多年了，西曆到現在祇得一千九百三十年，黃帝的時候已遠在西曆之前，現在所定的國曆不過是把我原有之物取回罷了。¹⁰⁹

以上言論並不是個案，一篇名為〈陰曆之研究及其廢除之理由〉的文章也提到，「我國在民國以前，亦有太陽曆」，並以太平天國頒行的新曆為例，指出其「恰與陽曆之閏年相同」，證明「中華民國以前，即有太陽曆也」，進而推論出太陽曆不是外國曆，則中國以太陽曆為「國曆」自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¹¹⁰「國曆是我國

¹⁰⁸ 〈通信〉（羅家倫致熊十力），《新潮》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頁837。

¹⁰⁹ 牟烈猷：〈國曆和廢曆〉，頁31。

¹¹⁰ 瞬初：〈陰曆之研究及其廢除之理由〉，《申報》，1929年2月15日，第6張，第23版。

原有的日曆」、「現在所定的國曆不過是把我原有之物取回罷了」很能道出當時部分人士的心態。既然國曆本是我國所固有，現在以西曆為「國曆」不過是恢復其本來的稱呼與身份。既然「國曆是我國原有的日曆」，政府在提倡「國術」、「國醫」與「國藥」的同時，推行「國曆」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依照這種認知，「以西為國」是表面的，本質上還是「以中為國」。這儘管只是一種虛懸的想像，卻可以解釋為何部分「保守」者不但不反對「以西為國」的做法，反而大力支持國曆。

南京國民政府的諸多要人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蔡元培(1868–1940)在一次宣傳「國曆」的演講中談到，提倡國曆並非「學時髦」，與時人說話高興夾幾句英語，穿衣服喜歡穿洋裝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國曆」本就是我國固有的曆法。蔡元培認為「中國向來奉行陰曆，其實應用節氣，實已陰陽合用」，譬如「一年二十四節，若春分等，是完全應用陽曆的道理」，所以「現在我們用陽曆，並非學外人，而是在全世界各種曆法中，擇一種最合理、最科學的曆法，以為應用上之便利與準確，並非盲從，是出於自己挑選」。¹¹¹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第一百次「總理紀念周」時，吳稚暉(1865–1953)作主題演講時也談到：「或謂陰曆不僅僅便於習慣，尚有愛國心，因陰曆為中國的，陽曆是外國的。此說頗有討論價值，陰曆即夏曆，夏禹以前堯舜時代，夏禹以後商周時代，並非陰曆，可見陽曆本為中國古代所固有。」¹¹²吳氏鑒於民間有以「愛國」為由拒絕以陽曆為國曆的情況，提出中國在堯舜和商周時代曾推行過陽曆，進而推論出陽曆也是我國古代固有的曆法，其看法與前述諸人一脈相承。不過國民黨內部對此問題的意見也不盡一致，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在宣傳國曆時就特別強調：「也許會有人從這國曆二字的字義上，要聯想到到底是中國古時的舊曆，這便大錯而特錯了。」¹¹³

上述各言說，均旨在說明中國早有使用陽曆的歷史，如今改「陽曆」為「國曆」，不過是正本清源。同時，上述諸說雖稍顯偏離事實，卻有據可循。高魯本人雖反對以西曆為「國曆」，但其言說卻為上述諸人提供了理論資源。為減輕民眾

¹¹¹ 〈推行國曆演講大會，昨特請蔡元培演講〉，《民國日報》，1930年12月29日，第2張，第3版。

¹¹² 〈中央與國府之紀念周：吳稚暉報告推行國曆法〉，《申報》，1931年2月24日，第2張，第7版。

¹¹³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為實行國曆告各界民眾書〉，《申報》，1929年1月1日，第7張，第25版。

對「國民曆」的排斥情緒，高魯在名文〈國民曆釋疑〉中，強調現在的「國民曆」實則保留繼承了中曆的節氣。高魯認為「節氣之遞，本諸太陽之運行」，而節氣由來甚古，「非漢人創之，漢人亦沿三代古曆而採用」，與之相對，西人的曆法「未嘗用過節氣」。高魯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即中曆不但不是陰曆，而且「中曆氣節之推算，亦以太陽過宮為主，適與國民曆推算之基本相同」。¹¹⁴雖然高魯強調的是「國民曆」與中曆的共通之處，但他的這套言說為上述諸人所借鑒，衍化成「國曆是我國原有的日曆」之說。

自然，近代中國的知識人之所以提出「西學中源說」，重點並不是一種實際歷史起源的主張，而是一種政治主張，目的在於將外國的知識嵌入帝制中國「儒學」的框架之中。¹¹⁵而「國曆是我國原有的日曆」這種新時代的「西曆〔學〕中源」之說，¹¹⁶用意頗為類似，此種構建「陽曆」歷史的做法，雖屬強相比附，不無自欺欺人、牽強附會之處，但在那個「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時代，構建一個中國「陽曆史」，以證明陽曆本是中國固有曆法，既可以維護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又似乎可以調和「以西為國」學理上的缺失，且同時滿足「國曆」的三重義，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情感與事實學理層面的矛盾。復因對國曆含義認知的不同，部分趨新人士眼中「國曆」即陽曆，是指國家頒行的法定曆法；而在部分「保守」人士眼裡，國曆的「國」字含義與國學、國藥、國術等國字號事物相同，特指中國固有舊有之物。這兩個群體對國曆「國」字含義的認知本是截然相反，「趨新者」認為國曆的「國」字代表著「西」與「新」，「保守者」則認為其代表著「中」與「舊」，而論證的結果卻相同。一為求新，所以要捨棄陳舊的「廢曆」（陰曆），推廣「國曆」；一為稽古，所以要保存我國固有的「國曆」（陽曆）。也因如此，陽曆巧妙地完成了從「西（洋）曆」到「國曆」的轉換，加之時人有意構建陽曆的歷史，對「國」字與「國曆」的認知本是彼此對立的兩群人，最後竟同時認可「國曆」這一稱呼。¹¹⁷

¹¹⁴ 高魯：〈國民曆釋疑〉，頁87–88。

¹¹⁵ Leigh Jenco, "Histories of Thought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The Curious Thesis of 'Chinese Origins for Western Knowledge' 1860–1895," *Political Theory* 42.6 (2014): 658–81.

¹¹⁶ 筆者按：「西學（曆）中源」說其實頗具歷史繼承性，王夫之、梅文鼎、魏源等人已持有此觀點，參朱文哲：〈西曆·國曆·公曆〉，頁128。

¹¹⁷ 筆者按：一般百姓眼中，政府推行的曆法依舊是「洋鬼子」的東西，見嚴元章：〈廢曆新年在新都〉，頁332。

一個國家在其強盛時代，對於異域的事物、文化，常能抱持一種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開放心態。而等到國勢衰微時，對於異域的一切事物也難免會有比較與戒備之心，甚至閉關自守，拒絕接觸吸收外來文化與事物。包容開放的心態消失，不能開放度量，大膽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吸收。魯迅對此心態有極為精到的闡釋：

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決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¹¹⁸

而此時「西曆中源」理論的構建，正是源於「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要之，當時很多人能夠坦然地接受以西曆為「國曆」，是因為他們本就把國曆視為與國學、國術一類的國字號事物，以為當時所行之西曆本就是中國固有，將西曆更名為國曆，只不過是恢復西曆本該有的地位。化用前賢之言，時人既喜西曆推步之術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憂其「以西為國」，用夷變夏，為求兩全之法，於是「西曆中源」之說乃成。甚至如前述，或因部分人士眼中的國曆本就是中國之本土曆法，於是當時出現了一面排斥西曆年號，一面大力提倡國曆的奇景，前述蔣介石的做法，似也不足為奇。從某種意義上講，最初以陽曆為「國曆」的發起者，其思考未必那麼深遠，但後來的提倡者則是知道「國曆」的複雜性，卻故意視而不見，將錯就錯。陳獨秀(1879–1942)認為「『國學』本是含混糊塗不成一個名詞」，¹¹⁹此時的「國曆」，可能亦是如此。

同時，也要注意的，所謂的中曆其實也早已不是純粹的中國本土曆法。明清之間，中國曆法發生根本性變化：《崇禎曆書》雖是徐光啟(1562–1633)受旨督領修曆，但實際是一部西人主導的用西法制定的曆書。¹²⁰《崇禎曆書》雖未

¹¹⁸ 魯迅：〈看鏡有感〉，《語絲》第16期(1925年3月2日)，第4版。

¹¹⁹ 陳獨秀：〈國學〉(1923年)，收入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卷，頁101–102。

¹²⁰ 筆者按：如採用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的天文體系，並用幾何學方法計算月與地、五大行星與太陽的圓運動；引入西方地理經緯度、視差、蒙氣差等概念，並把天文曆法逐步引入了科學範疇等。參杜昇雲等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轉軌與近代天文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頁15–25。

行而明亡，但為清代所刪改利用，從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主持欽天監開始，到畢學源 (Caetano Pires Pereira, 1763–1838) 擔任欽天監右監副，¹²¹ 將近兩百年時間，除偶有反覆外，一直是西人主持欽天監與負責天文曆法的制定，甚至所用天文儀器之原型亦為西洋產物。同時，當時製曆所採用的第谷體系，實為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生卒年不詳) 體系與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體系的折衷，本就處在不新不舊之間，加上此時製曆儘管用西法、西人，但曆書在形式上仍是傳統之貌，此時的曆書真可謂一種「中西合曆」。¹²²

民國曆法研究領域的專家很清楚這一點，1919年，時任中央觀象臺臺長的高魯呈文教育部，請禁止民間根據清朝《萬年曆》製造私曆時，其理由便是中央觀象臺頒制的曆書，從民國三年(1914)起已「改用西人最新之法」，而「本臺所採，既為西人最新之法，則《曆象考成》，乃西人二百年前舊法，當然在廢止之列！」¹²³ 前揭名為〈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的文章也提到，陰曆所採用的是「二百年前的老法子」，「比起現在最新的法子，自然是差的很多」，而「舊曆同國曆，既然都是西人的法子，我們為什麼不用新法子的國曆，還去守著那舊法子的萬年曆呢？」¹²⁴

「廢曆」並非「全舊」，有其新的一面，只不過是西洋的「舊西法」；「國曆」亦非「全新」，亦有其舊的一面，不但已產生數百年，且有所謂「落後迷信」的宗教元素，為此，時人還創製了為數不少的新曆法提交有關部門討論。¹²⁵ 以當時國人「追西崇新」的激進心態，或許世界曆 (The World Calendar)，因為更新更先進與更科學，可能更適合作為中國之「國曆」。¹²⁶ 從中西曆的新舊糾葛來看，與其說是西曆戰勝了中曆，倒不如說是更「新」的西曆戰勝了稍「舊」的西曆，「新西法」戰勝了「舊西法」，是一種同質事物的新舊之爭，亦即西與西戰。

¹²¹ 屈春海：〈清代欽天監暨時憲科職官年表〉，《中國科技史料》1997年第3期，頁70。

¹²² 筆者按：按陳遵媯的劃分，「清代的曆法，他是西洋的法數，以就舊曆的規模，就是中西合法時期」，見陳遵媯：〈國曆的好處〉，第3張，第9版。

¹²³ 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編丙，頁1094。

¹²⁴ 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國民應當遵用國曆淺說（續）〉，第2–3版。

¹²⁵ 余青松：〈國內改曆意見與世界曆〉，《東方雜誌》第34卷第13號（1937年7月），頁48–64。

¹²⁶ 筆者按：1937年5月31日，教育部召集曆法研究會之結果，亦決定採用世界曆，但最後因時局與現實的因素未能實現，見余青松：〈國內改曆意見與世界曆〉，頁67。

六、國曆與國醫：國字號事物的各自命運

1923年，顧實(1878–1956)在其起草的〈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一文，特別提到國字號事物產生的時代背景：

自昔閉關一統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迨海禁既開，稍知西方，於是有中西對舉之名詞，如中文西文，中學西學，中醫西醫之類是也。邇來國家觀念，普及於人人，於是國民、國文、國語、國樂、國技、國粹、國故、國產，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復觸目皆是。¹²⁷

在那個國字號事物觸目皆是的時代，以「科學」自任的西醫掀起了「廢止舊醫」運動，自稱「新醫」、「科學醫」；中醫界則依託民族主義自號為「國醫」，並借助行政權力建立了「中央國醫館」，社會上出現了「國(舊)醫」與「西(新)醫」、國藥與西藥對立的現象。¹²⁸ 雷祥麟(Sean Hsiang-lin Lei)認為，「國醫」這個名稱顯示，當中醫支持者被迫面對來自國家的威脅時，他們的回應策略卻是致力將自身的未來和國家的未來緊密地連結在一起。¹²⁹ 然而所謂中醫的「國醫」名號，西醫對此並非沒有意見。¹³⁰ 如前所述，雖然有心人構建了一個中國「西曆中源」理論，但這一說法畢竟不能完全自圓其說，本質上確係以西曆為國曆。那是一個「國字輩的弟兄們，大出風頭」的年代，¹³¹ 一切事物一旦「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樣子」，¹³² 對於西洋曆法能在中國取得國字號稱謂，當時的部分西醫頗為欽羨，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國字名號的爭奪。

¹²⁷ 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國學叢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頁121。

¹²⁸ 參郝先中：〈近代中醫廢存之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

¹²⁹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p. 5.

¹³⁰ 筆者按：「國醫」一詞大致生成於二十世紀20年代後期，一開始只有國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面貌，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強調與「西方」是不同的，從1929年起，被抗爭的醫藥團體正式納入「正名」運動的一環，逐漸成為被認同的一個名詞。因此，國醫之「國」所代表的涵義也是變動的，從一開始的國粹變成後來的國家，並追求以萬國為比肩的國家法令的認同。參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收入《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頁251、269、299。

¹³¹ 豈凡：〈國字輩太不爭氣〉，《一般》第9卷第4號(1929年12月)，頁606。

¹³² 何炳松：〈論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20卷第1號(1929年1月)，頁4。

當時的部分西醫注意到，南京國民政府一面提倡「國曆」，一面卻又維護「國醫」。在醫學界看來，既然國民政府「以西曆為國曆，舊曆為廢曆」，為何「不以『西醫』為國醫，舊醫為廢醫？」¹³³為此，當時部分醫學界人士，嘗試借助相關行政手段，希望能以西醫為「國醫」。1931年，上海醫師公會認為中醫是「以非科學之根據，行不完善之方法」，所以「國中人士，倡言廢棄」。該公會有鑒於「近來國中新醫舊醫，正在擾攘，玄學科學，猶尚紛爭，民眾眩惑於是非，政事彷徨於歧路，教育系統，根本動搖；衛生政策，窒礙正多；駢拇枝指，決非黨國發展之福音，尤非政治修明之現象」，在「中央秉先總理遺訓，召集國民會議」之時，通過胡庶華（1886–1968）向國民會議提案：「以科學醫為標準，定科學醫為國醫，亦猶廢陰曆用陽曆為國曆之意也」。¹³⁴這是上海醫師公會看到「陽曆」作為西曆取得國字號地位，從中獲得靈感，希望得到政府背書推廣西醫，以「西醫」為「國醫」。到1932年，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大會期間，西醫師還通過一項重要決議「舊醫不得稱國醫二字，以免混淆觀聽」，禁止中醫師使用國醫一詞。¹³⁵

孫伏園（1894–1966）也注意到「國曆」本為西曆，所以「人們一看見『國醫』二字，便立刻想到國醫即是西醫」。在孫伏園看來，「選定不定選定西洋的曆法作國曆，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選定西洋的醫學稱為『國醫』，那是十分應當的事」，因為「現在西洋各國所用的醫學，確比我們固有的醫學高明萬倍。陰曆與陽曆，只是兩種不同的曆法，是平行的；中醫與西醫，卻是醫學進程上兩種必經的階段，是先後的」。因此，我國的國醫應該是「代表現代科學研究結果的西醫」，至於現在「國中以中醫為職業者，雖未經政府選定，卻在口頭或用文字，有意無意的常用『國醫』二字代表中醫！這是不合於事實的」，必須處理，予以糾正，不然「讀者也將漸漸受其影響，以為政府真有一日將中醫選定作為國醫了」。¹³⁶

中醫界當然不同意上述看法，在當時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1880–1950）看來，「國醫」的產生有其時代背景，本就是為區隔西醫而產生：

¹³³ 逸：〈社評：國醫與國曆〉，頁2277。

¹³⁴ 〈上海市醫師公會請明定黨國醫事方針〉，《新聞報》，1931年5月10日，第4張，第13–14版。

¹³⁵ 〈中華醫學會大會紀要〉，《中華醫學雜誌》第18卷第6期（1932年12月），頁1146。

¹³⁶ 伏：〈國曆與國醫〉，《民間》第1卷第9期（1934年9月），頁28。

國醫一個名辭，在我們中國向來是沒有的。自從西洋的醫學傳到我們中國來，為要避免和西洋的醫學混同起見，所以從主體上特別提出「國醫」的名辭來。這好比我國的文字本來無稱為「國文」的必要，因為同時發見了英文、德文、日文等等不同的諸種文字，於是主體的提出了「國文」一個名辭是覺得非常的必要。¹³⁷

焦易堂還特別提示，「切莫以為加上了一個國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狹義的國家主義」。¹³⁸

對於所謂「國醫」的名號，西醫與西醫的支持者更多的是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國醫」一詞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自然也不屑去爭奪這一名號，因為當時中國「要的是科學，是步武西方，以建設新的中國，卻不是什麼『國學』、『國醫』、『國技』」。¹³⁹余雲岫(1879–1954)即專門撰文批評焦易堂的觀點，在余氏看來，醫學屬於自然科學，文字屬於人為標記，出於民族習慣，二者不可以相提並論。所以「文字是跟隨習慣而來，盡可以各國不同，醫藥是依據真理為歸，根本沒有可以立異的地方，簡單說一句，英文、德文、日文、國文，是可以有的，英醫、德醫、日醫、國醫，在學術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¹⁴⁰

與余氏類似的觀點在當時頗多，章克標(1900–2007)即認為「醫只有為人類治病的醫，沒有什麼國不國的」，其甚至極端地表示：

若使一定要國醫，即使技術上國醫是靠不住，但因為要盡國人的職任，而生病起來非冒了萬死一生的危險去請教國醫，在我個人是不願意的，我寧願不做了國人而做個自由人，我們的生命沒有為了一個空虛的國字而冒險的必要。¹⁴¹

¹³⁷ 焦易堂：〈為擬定國醫條例敬告國人書〉，《國醫公報》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頁1。筆者按：是文亦被《中央夜報》、《中央週報》、《醫藥評論》、《中醫世界季刊》、《廣濟醫刊》等眾多刊物刊載。

¹³⁸ 同上注。

¹³⁹ 余雲岫：〈焦易堂為實行國醫條例告國人書之商榷〉，《醫事彙刊》第16期(1933年8月)，頁24。該文影響頗大，被《社會醫報》、《廣濟醫刊》、《醫藥評論》等報刊轉載。

¹⁴⁰ 此為鄭振鐸為何炳松〈論所謂「國學」〉一文所作引言，見何炳松：〈論所謂「國學」〉，頁1。

¹⁴¹ 豈凡：〈國字輩太不爭氣〉，頁606–607。

在時人看來，「國醫」與「中央國醫館」都不應該存在，「醫學，科學也，科學無國境，真理不兩岐。將謂『國醫』而係科學的醫學乎？則國醫之名無存在之必要。如謂國醫而非科學的醫學也，則國醫館之設立，有背總理之遺教」。¹⁴²

那是一個國字號事物勃興流行的時代，國字號事物看似興盛強勢，甚至可以仰借政府行政權勢，但其實反對者、鄙夷者亦不少。當時有人譏諷道：

因為國民革命的頭上有個國字的緣故吧。自從國民革命成功以來，國字輩的弟兄們，大出風頭。開國貨展覽會，開國術競技會，提倡國學，鼓吹國醫，國術館遍設於各地，考出什麼國士來，真是熱鬧非凡，差不多要令人疑心國運已轉，國光可張了。¹⁴³

何炳松（1890—1946）對國字號事物提出過很尖銳的批評，認為此類事物代表的是一種自大精神、主觀精神，表現出一種狹小的國家主義。在何炳松看來：

我國近來「國」字的風靡一時，好像中國無論什麼一種醜東西，只要加上了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樣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調子，現在不叫做小調而叫做「國樂」了。賣狗皮膏藥的勾當，現在不叫做走江湖而叫做「國醫」了。甚至前一個月上海四馬路上的餛飩鋪，亦要叫做「國菜館」了。這樣類推下去，那末小腳、辮子、鴉片等等東西。亦都可以叫做「國腳」、「國辮」或者「國煙」。這不但弄得「斯文掃地」，而且「國」字竟變成一切妖魔鬼怪的護身符了。¹⁴⁴

將何炳松引為同調的鄭振鐸（1898—1958）甚至認為「保存所謂『國故』、『國學』，則恐怕國將不國」。¹⁴⁵

「中醫」變為「國醫」，帶來的未必完全是正面的影響，但中醫不僅是實用的醫學科目而已，在近代中國，「國醫」作為一種傳統學術與身體認知文化的集體

¹⁴² 金鳴宇：〈對於設立中央國醫館之意見〉，《醫藥評論》第43期（1930年10月），頁29。筆者按：該文頗有影響，被《申報》、《社會醫報》、《醫事彙刊》、《廣濟醫刊》、《日新治療》等報刊轉載。

¹⁴³ 豈凡：〈國字輩太不爭氣〉，頁606。

¹⁴⁴ 何炳松：〈論所謂「國學」〉，頁4。

¹⁴⁵ 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20卷第1號（1929年1月），頁11。

認同，代表的更是一種文化上的述求、認同與競爭，蘊含著民族與文化的意義。¹⁴⁶ 研究者注意到，由於現代中文常將「國家」與「民族」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因此「國醫」一詞的意義變得十分模稜兩可。一方面，國醫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中國特有的東西，亦即中華文化的「國粹」；另一方面，國醫也可以理解為受到中國國家正式認可的醫學。¹⁴⁷ 但在當時的一般社會風潮下，以中醫為「國醫」更符合普遍規律，以西曆為「國曆」實為特例。國字號事物中雖出現了「國曆」這樣的異類，但西醫終究不能以此為契機，順勢成為「國醫」。

不過重要的是，推行「國曆」與提倡「國醫」、反對「國醫」者的理論邏輯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使得三民主義與孫中山思想迅速成為以國民黨為主導的國民政府所奉行的中心思想，「國醫」即緊緊地抓住民族主義這一要目加以發揮。¹⁴⁸ 在中醫看來，「中醫」能否成為「國醫」，事關「國體」、「國本」，以「中醫」為「國醫」，「絕對不是舊，是維新；不是復辟，是革命；不是開倒車，是開快車」，遵循的是孫中山的學說理論，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健康」與「總理民生主義」的實現。¹⁴⁹ 而爭奪「國醫」名號的「西醫」，其實用的也是這一套理論體系，雙方都以民族與國家利益自命，以孫中山的傳人自居，但因利益、立場、知識背景的不同，往往得出相異乃至相反的結論。

在當時的社會情勢下，國曆也從一種時間秩序體系，發散為政治與社會文化概念，成為他方人士在建構自己經驗範疇裡的國字號事物合理性的思想資源。而是否能夠得到國家行政權力的支持與利用當時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事物在當時取得「國」字名號與地位的關鍵，也正是得到國家行政權力的背書，「西曆」才能由「洋曆」上升為「國曆」，成為近代國字號事物中的異類。

¹⁴⁶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頁255–56、287。

¹⁴⁷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p. 109.

¹⁴⁸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頁258–59。

¹⁴⁹ 〈中央國醫館籌備大會行開會式速記錄〉（1931年3月17日），《國醫公報》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頁9–10。

七、結語

南京國民政府將舊曆視為「一切迷信的源泉」與「帝王專制思想」的象徵，¹⁵⁰宣布其是必須廢除的「廢曆」，但實際做法卻是廢曆不廢節，廢除舊曆，卻將舊曆節日移植到國曆之中。¹⁵¹而「革命」的「國曆」不但紀年仍沿襲中國傳統之法，還吸收了「廢曆」中所謂「迷信」與「專制」的內容，成了頗具「中國特色」的「國曆」，其表明作為追尋現代性後進國的中國，要加入現代的世界體系之中，一方面無可迴避的是要加入對手方，但近代中國擁抱西方的方式皆非全然拋棄傳統，更偏向有選擇地兼容調適兩者，既有抵抗也有接受的成分，試圖在現代與傳統的光譜間取得平衡。這種對現代性的處理方法更準確來說可視為一種「全球化的在地實踐」，而非全然的西化或是純粹的本土化。這一現象亦非近代中國所獨有，彼時日本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都需在己身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借鑒西洋文化，加以本土化，並試圖加入歐洲史以及世界史的框架之中，個中差異在於中、日兩國接受現代性的洗禮，遲速有別。

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所頒行的國曆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在原有西曆基礎上的「重新建構」。為宣示國家正朔、革命正統並與世界時間接軌，國民政府試圖建立其主導的革命時間秩序，陽曆由此上升為「國曆」，名號的更易具有明顯的價值傾向性，而「國曆」名號所具備的政治與社會權勢顯然不是陽曆所能比擬。¹⁵²國曆較之格里曆（陽曆），在曆書的形式、內容、名稱等方面，有一個創造性的轉換，這進一步造成國曆在概念上的曖昧與籠統，以及國曆與格里曆的分異。

不過，名號的更易並不影響曆書的實際應用，陰曆雖成為所謂「廢曆」，但國人最常用的反而是已廢的「廢曆」。西曆雖由陽曆上升為「國曆」，但其無法與長久以來形成的民間民俗完全契合，既不符合當時的命名規則，又沒有得到深入應用。儘管政府將不遵國曆者上升到「反革命」、「民國的叛徒」的程度，當時

¹⁵⁰ 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為實行國曆告各界民眾書〉，第25版。

¹⁵¹ 筆者按：關於南京國民政府移置舊曆節日的詳細情況，參王建軍：〈「誅影以滅形」〉，頁80-91。

¹⁵² 正如英國史學家伯克（Peter Burke）所指出的一樣，「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concepts are not neutral “tools”），參伯克著，姚朋等譯，劉北成修訂：《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7。

依然出現了「禁者自禁，售者自售」的現象，相當數量的出版物，封面（或文章標題）以「國曆」為名，實際內容卻寫作「陽曆」、¹⁵³「公曆」、¹⁵⁴甚至「西曆」，¹⁵⁵即使是政府部門的出版物也不例外。¹⁵⁶

綜核名實，無論從概念的嚴謹性，還是歷史的真實性而言，陽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未必那麼適合命名為國曆。中西曆在當時中國本各有所長，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在變化即進化的時代觀念下，¹⁵⁷南京國民政府意圖通過變更曆法名號，確立其正統地位，展示其「革命」、「進步」的形象，由此使得曆法名稱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這一做法實則脫離民俗、漠視民意、忽略民情，無視高魯等專家的意見，對國字號事物的特殊性視而不見，強以「洋曆」作「國曆」，並將中曆定為「廢曆」，其所推行的「國曆」實際並不能制名以指實，最終導致了「廢曆」不廢與「國曆」不「國」的尷尬局面，也為近代中國的國字號事物增添了一個異類。這個異類，既不同於國學、國醫、國術等中國所固有（獨有）國字號事物，又與國旗、國歌等近代民族國家產物有所差別。所謂的「廢曆」與「國曆」，其實最後都變成中西新舊互滲雜糅的曆法，非驢非馬，不中不西，亦新亦舊。

西曆成為「國曆」，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咱們的國家可惜太弱了」，不能抵禦外來的東西，一味迷著外國人的一切，所以舊曆被禁止，外國曆成為「國曆」。如果國家強盛起來，「外國人不一定也要奉行我們的舊曆為他們的國曆的」。¹⁵⁸但國家的強盛，並不意味著中國固有事物會成為國字號事物，國學、國醫、國術等國字號事物反而是國勢衰頹之時出現。近代中國，面對西洋的步步進逼，在抵抗西洋這個「他者」的過程中，在「國」將不國之時，國家、國族意識覺醒，國字號事物應運而生。國學是所謂「國將不國之學」，「國醫」、「國術」等國字號事物，也是在「國」將不國之時，為與西洋事物區隔、競爭而出現。中西比較觀念

¹⁵³ 國立編譯館編：《短期小學課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冊，頁52。

¹⁵⁴ 王定九編：《上海顧問》（上海：上海中央書店，1934年），頁579-86。

¹⁵⁵ 李炳衛：《北方快覽》（北京：北平民社，1932年），頁2。

¹⁵⁶ 筆者按：如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為方便軍官換算年齡製作的〈年齡換算表〉與〈陰陽曆對照表〉，採用的是陰曆、陽曆對照，而不是國曆、廢曆這種更官方的稱謂，參〈軍政部軍需署令發年齡換算表、陰陽曆對照表、修正履歷規則〉（1936年12月-1937年1月），《軍政部糧秣實驗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94-124。

¹⁵⁷ 桑兵：〈分說：近代中國國字號事物的命運〉，頁47。

¹⁵⁸ 落漠：〈舊曆除夕的追憶〉，《大公報》，1930年2月12日，第4張，第15版。

的出現、國家意識(或民族意識、國族意識)的喚醒,以及來自西洋事物和概念的衝擊與反彈下,重估中國固有事物的價值,是國字號事物產生的時代大潮,而是否能夠得到國家行政權力的支持與利用當時的民族主義,則是一種事物在當時取得「國」字名號與地位的關鍵。

近代中國,按國字號事物的一般命名規則,本該是中國傳統曆法成為「國曆」。而西曆成為「國曆」,也為我們探求「國曆」概念的特異性及含混的曖昧特徵,更好地理解近代國字號事物的豐富內涵與整體面相提供了契機。而近代中國曆法名稱的變化,還展布了這一時期政治時勢和社會思潮的常情與變態,對於理解近代中西曆法制度交融與時間觀念變動多有助益。建構國曆,一面要「發皇民族之精神」以恪守民族本位,一面又要「求世界之大同」以融入世界,這凸顯了近代中國新曆法的複雜建構過程,可謂世界主義理想和民族主義情感衝突與融合的典型表現,即一邊試圖彰顯民族國家的時曆特色,一邊卻又不得不讓自己擠入世界時間體系的複雜張力中展開。

以「國曆」代替西曆、洋曆、耶曆等稱謂,本是為淡化西曆的「西洋」、「宗教」等色彩,並仰借國家政府的力量與名號,以推廣當時的西方標準時間體系。但為外來新事物創造新詞並非簡單容易之事,以「國曆」這種頗具本土意涵的漢語詞彙命名外來事物,很容易引起誤讀錯解。而隨著外部知識的大量湧入,部分國字號事物有讓位於「中」的傾向,「國學」與「中學」、「國醫」與「中醫」、「國藥」與「中藥」、「國文」與「中文」,前者突顯民族的意涵,後者則因更偏向地理方位而相對淡化了這部分色彩。「國曆」作為近代國字號事物中的異類,自然不會讓位於「中曆」,但在當時的社會情勢下,公曆因象徵著「世界通用」,地位愈發突顯,並隨著政權鼎革,成為新政權的官定稱謂,國曆的歷史就此終結。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及報刊

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

- 〈教育部訓令：為通令取締學生運動衣上濫用外國文字標識〉，1931年10月20日，
《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檔案號：5-5626(2)。
-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結購外匯購置外國書刊儀器文書〉，1939年1月—1944年
12月，《中央研究院檔案》，檔案號：393-1858(1)。
- 〈軍政部軍需署令發年齡換算表、陰陽曆對照表、修正履歷規則〉，1936年12月—
1937年1月，《軍政部糧秣實驗場》，檔案號：794-124。
- 〈中國國民黨雲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為請發給廿七年份國曆書表事致函內政部〉，
1937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檔案號：12(6)-16424。
- 〈一九三九年國民曆編印及分送案〉，1938年5月—1938年7月，《國民政府內政部
檔案》，檔案號：12(6)-16425。
- 〈行政院交財政部議案通知單：軍事委員會函為嗣後印刷法幣應取消背面之外國
文字改用本國文字請迅予改正由(附原函)〉，1941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
財政部檔案》，檔案號：3(6)-865。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八區黨部為請發給國民日曆十份事致函內政部〉，
1942年1月6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檔案號：12(6)-16428。
- 〈天文研究所為變更領發國民曆摘要辦法致內政教育兩部公函〉，1943年6月28日，
《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檔案號：12(6)-16429。
- 〈內政部為天文研究所函請變更領發國民曆摘要辦法等事致教育部公函〉，1943年
8月10日，《國民政府內政部檔案》，檔案號：12(6)-16429。

2. 引用報刊：

- 《一般》，1929年。
- 《上海黨聲》，1930年。
- 《大公報》，1928—1930年、1934年。
- 《小說月報》，1929年。
- 《中央日報》，1934年。

- 《中國天文學會會報》，1927–1928年。
- 《中華醫學雜誌》，1932年。
- 《內政公報》，1934年。
- 《古定先鋒》，1930年。
- 《司法公報》，1917年。
- 《民國日報》，1923年、1927年、1928年、1930年、1931年。
- 《民國日報·覺悟》，1921–1924年。
- 《民間》，1934年。
- 《申報》，1917–1935年。
- 《市政公報》，1939年。
- 《血滴子》，1929年。
- 《江西地方教育》，1937年。
- 《江蘇廣播週刊》，1937年。
- 《行政院公報》，1942年。
- 《時事新報》，1921年、1925年。
- 《東方雜誌》，1929年、1937年。
- 《松報》，1933年。
- 《社會醫報》，1931年。
- 《革命前鋒》，1929年。
- 《浙江警察雜誌》，1922年。
- 《責任》，1923年。
- 《真美善》，1930年。
- 《國民政府公報》，1927年。
-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1929–1931年。
-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928年。
- 《國學叢刊》，1923年。
- 《國醫公報》，1932–1933年。
- 《晨報》，1922年。
- 《晶報》，1939年。
- 《新青年》，1918年。
- 《新聞報》，1921年、1927年、1931年、1939年。
- 《新潮》，1920年。
- 《語絲》，1925年。

- 《農村月刊》，1930年。
《錢業月報》，1921年。
《興華報特刊》，1924年。
《醫事彙刊》，1933年。
《醫藥評論》，1930年。
《鐵道公報》，1933年。

二、專書

-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王定九編：《上海顧問》，上海：上海中央書店，1934年。
- 丘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佐藤仁史：《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與地域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李炳衛：《北方快覽》，北京：北平民社，1932年。
- 杜昇雲等主編：《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轉軌與近代天文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
- 伯克(Peter Burke)著，姚朋等譯，劉北成修訂：《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桑兵、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 神州編譯社編輯部編：《民國二年世界年鑑》，上海：神州編譯社，1913年。
- 國民政府時政委員會編訂、中華民國大學院監定：《國民曆》，1928年。
- 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編製，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教育部頒布：《國民曆》，1929-1949年。
- 國立編譯館編：《短期小學課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

- 教育部參事處編：《教育法令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陳展雲：《中國近代天文事蹟》，昆明：中國科學院雲南天文臺，1985年。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陳濤：《日本政界要人評傳》，上海：機杼出版社，1934年。
-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
- 黃竹齋：《竹齋叢刊》，西安：西京西山書局，1936年。
-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Harrison, He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三、論文

- 王建軍：〈「誅影以滅形」：南京國民政府與舊曆節日改造〉，《民國檔案》2022年第3期，頁80–91。
- 王楠：〈脫「土」入「洋」：近代「國貨」概念的現代性內涵〉，《北京社會科學》2024年第4期，頁46–55。
- 左玉河：〈擰在世界時鐘的發條上：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收入《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1輯，頁149–92。
- ：〈評民初曆法上的「二元社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頁222–47。
- 皮國立：〈「國醫」：近代中醫的轉型與再造〉，收入桑兵、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248–310。
- 朱文哲：〈西曆·國曆·公曆：近代中國的曆法「正名」〉，《史林》2019年第6期，頁127–37。
- ：〈科學與「黨義」：國民曆編訂的爭論及其意蘊〉，《人文雜誌》2018年第7期，頁98–109。
- 竹內弘行：〈民初紀年考〉，《中國研究集刊》第7號，1989年，頁21–29。
- ：〈清末の私紀年について〉，《名古屋學院大學論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7月，頁77–96。

- 村田雄二郎：〈康有為と孔子紀年〉，收入王守常、汪暉、陳平原主編：《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輯，頁513-46。
-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25-50。
- 屈春海：〈清代欽天監暨時憲科職官年表〉，《中國科技史料》1997年第3期，頁45-71。
- 陳旭麓：〈清末革命黨人的紀年〉，《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期，頁17、33-34。
- 陶夢覺：〈二十年中外大事紀略〉，《興華報特刊》1924年第21期，頁157-96。
- 張志明：〈中國近代的曆法之爭〉，《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頁106-19。
- 郭津嵩：〈僧一行改曆與唐玄宗制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3本第2分，2022年6月，頁367-407。
- 湛曉白：〈科學史和文化史雙重檢視下的民國改曆思潮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013年第4期，頁456-69。
- Kwong, Luke S. K. "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Qing China c. 1860-1911." *Past & Present* 173.1 (2001):157-90.
- Jenco, Leigh. "Histories of Thought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The Curious Thesis of 'Chinese Origins for Western Knowledge' 1860-1895." *Political Theory* 42.6 (2014): 658-81.

四、網絡資料

- 〈張樹幟電閻錫山賈榮稱奉來同講演遵用國曆事如何處理乞示〉，1922年1月4日，〈閻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037-001，臺灣國史館藏，網址：<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4617361C9=Of6U#0bF>（讀取日期：2022年10月27日）。
- 〈張樹幟電閻錫山賈榮稱奉來同講演遵用國曆事如何處理乞示〉，1922年1月5日，〈閻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448-001，臺灣國史館藏，網址：<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46173496gcBQhT#3dJ>（讀取日期：2022年10月27日）。

「國家」、「國故」與「國民」： 近代「國曆」的名實錯位與中西糾葛

(提要)

王建軍

近代中國，按國字號事物的習用命名辦法，本應中國傳統曆法成為「國曆」。但當時的「國曆」竟為西曆（亦稱陽曆），該曆既不同於「國學」、「國醫」等中國所固有的國字號事物，又與「國旗」、「國歌」等近代國家產物有所區別。在推動以「國曆」命名西曆的進程中，看似簡單的名號變化，其實飽含嚴謬聲（1897–1969）等人不能明言的「苦心」。彼時「國曆」的含義本有多重，時人的認知也不盡一致，甚至對立，主要包含「國家」、「國故」、「國民」三個層面的內涵。為證明以「國曆」命名西曆的合理性，一種「西曆中源」理論被有意無意地構建，西曆竟被證明是中國固有曆法。在「國曆」稱謂之外，「國民曆」纔是南京國民政府官定曆書的正式稱呼，也更不易引起誤會，並為高魯（1877–1947）、陳遵媯（1901–1991）等專家認可，唯他們的意見未被重視。以西曆為「國曆」的現象也為醫學界所注意，並為部分西醫所欽羨，由此引發了一場「國醫」名號的爭奪。南京國民政府對國字號事物的特殊性視而不見，強以「洋曆」作「國曆」，改「中曆」為「廢曆」，但其所推行的「國曆」並不能制名以指實，「國曆」遂成為近代國字號事物中的異類。

關鍵詞： 國曆 國民曆 國醫 國字號事物 嚴謬聲

The “National Calendar” in Modern China: Disconnected Denotation and China-West Entanglement

(Abstract)

WANG Jianjun

According to the customary naming conventions for terms with the “national” label in modern China,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should have been called the “National Calendar” (*Guoli*). However, the National Calendar actually referred to the Western (Gregorian) calendar at that time, which was a departure from names of other subjects inherent to China, such as *Guoxue* (traditional learnings) and *Guoy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rom those of modern national symbols like *Guoqi* (national flag) and *Guoge* (national anthem). The seemingly straightforward process of designating the Western calendar as the National Calendar was, in reality, filled with unspoken undercurrents and agenda from scholars and officials such as Yan Eshe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term “National Calendar” and its significance varied markedly among contemporaries (even contradictory at times), but the term primarily encompass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nation, as well as its heritage and people. To justify the adoption of the Western calendar as the National Calendar, a theory about “Chinese origin of the Western calendar” was constructed to suggest that the Western calendar was inherent to Chinese traditions. Aside from “National Calendar,”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calendar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actually “Citizens’ Calendar” (*Guomin li*), which was less likely to cause misunderstandings and was recognized by experts like Gao Lu and Chen Zungui, although their opinions were not given due attention. The adoption of the Western calendar as the National Calendar also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cal field and became a subject of envy for some local practitioners of Western medicine, thus triggering a contention over the term “National Medicine” (*Guoyi*).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overlooked the uniqueness of the “national” label, insisting on adopting the Western calendar as the National Calendar and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calendar as *Feili* (obsolete calendar). However, the National Calendar they promoted could not fully represent its intended meaning, thus becoming an anomaly among the modern Chinese terms with the “national” label.

Keywords: National Calendar Citizens’ Calenda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rms with the “national” label Yan Esheng

